

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党中央（“帮中央”）直接领导，王洪文兼总指挥（这是“十大”后，王洪文提出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中央直接领导，我兼总指挥）。马天水说：同意你们准备的意见，关于民兵体制问题，你们要多讲我们上海民兵这个新生事物。多给他们看民兵好的单位，要全国各省、市也象上海这样搞。全国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来领导全国的民兵工作。这些意见作为你们的话去说。我又对周说：你们不要把这些意见说我们说的，用你们的意见、要求去说……。这是我参与“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犯罪人

王秀珍

1978.9.26

（内部参考材料）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十八）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三部分 反军乱军的阴谋活动

- 一、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写信给张春桥、姚文元诬陷上海警备区……………（1）
- 二、张春桥指使民兵指挥部整理对南京军区的意见的记录……………（5）
- 三、钟定栋关于王秀珍传达张春桥的意见时所作记录的揭发交代……………（5）
- 四、钟定栋写信给王秀珍要求转递诬陷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的材料……………（6）
- 五、钟定栋、郑惠仪送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诬陷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材料……………（7）
- 六、王洪文在一封诬告信上的批语……………（14）
- 七、王日初关于王洪文准备利用一封诬告信攻击上海警备区的揭发交代……………（15）
- 八、马天水传达张春桥的几句话给上海警备区的书面通知……………（16）
- 九、张春桥、王洪文在一封诬告信上的批语……………（16）

十、马天水策动支左人员搞乱上海警备区的字条	(18)
十一、“四人帮”驱使“第二武装”把枪口指向人民解放军	(18)
十二、王秀珍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次“秘密战备”问题的揭发交代	(20)
十三、钟定栋炮制《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过程的揭发交代	(21)
十四、钟定栋关于一九七四年四月的“战备行动”是针对上海警备区的揭发交代	(22)
十五、马天水关于反军乱军的揭发交代	(23)
十六、徐景贤关于反军乱军的揭发交代	(23)
十七、王秀珍关于反军乱军的揭发交代	(24)
十八、张敬标关于反军乱军的揭发交代	(32)
十九、李彬山关于反军乱军问题的揭发交代	(34)
二十、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白国良在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发言	(37)
二十一、钟定栋的《认罪书》(节录反军乱军部分)	(44)
二十二、上海民兵指挥部攻击、诬陷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的大字报选编照片	(46)

第四部分 “第二武装”是“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一、查封中央各部和各省、市驻沪办事处	(49)
1.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查封驻沪办事处方案	(50)
2. 查封驻沪办事处作战计划的照片	(51)
3. 查封行动准备工作的字条	(52)
4. 查封行动指挥部的分工及各组电话	(57)
5. 上海市文攻武卫查封驻沪办事处的通告	(54)
6.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印制的封条	(55)
7. 上海《工人造反报》对查封行动的报导	(55)
二、查封行动遭到中央有关部和许多省市的质问和抗议	(56)
1. 山西省革会、六机部等单位对查封行动提出的意见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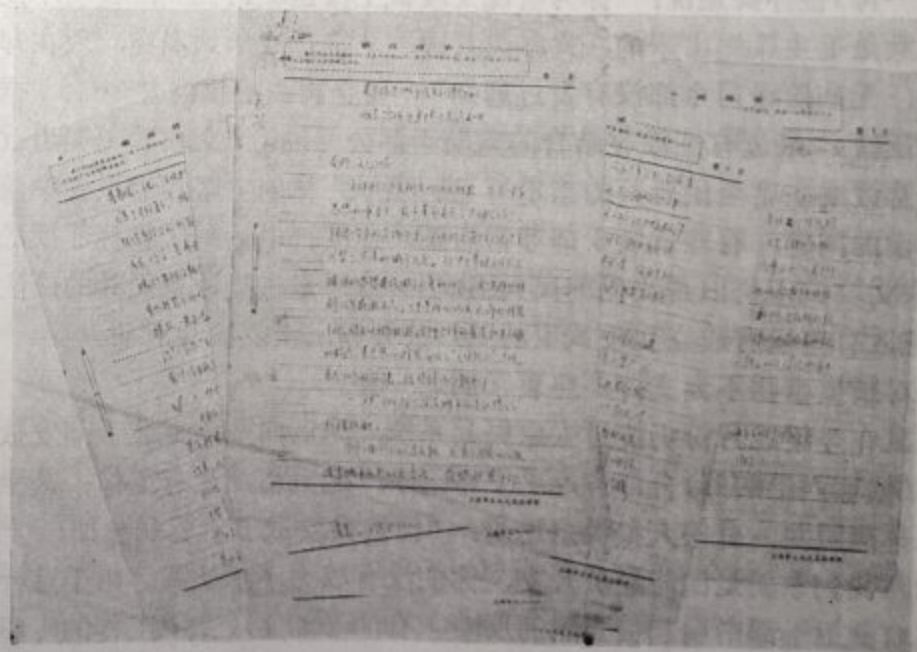
2. 煤炭部驻沪办事处工作人员当面提出的质问和抗议	(57)
三、王洪文要“第二武装”准备镇压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	(59)
1. 王秀珍的揭发交代	(59)
2. 上海民兵指挥部拟制的镇压群众的方案	(59)
3. 钟定栋关于制定“反击”方案经过的揭发交代	(61)
4. 王秀珍等“视察”夜间“拉练”队伍时的照片	(63)
5. 一九七六年四月，公安、民兵联合拟制的《“4220”演习命令程序》	(64)
6. 钟定栋关于“4220”联合演习方案的揭发交代	(65)
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证	(66)
1. 十年间“四人帮”在上海搞法西斯专政几个数字的统计	(66)
2. “第二武装”抓人用的“查询证”	(68)
3.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海员俱乐部门口任意抓人	(68)
4. “文攻武卫”使用的藤帽、长矛等武斗工具	(71)
5. 上海民兵指挥部炮制的《上海民兵城市里弄小分队暂行工作条例》	(71)
6. 上海民兵指挥部炮制的《关于上海郊县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72)
五、“对第二武装”在上海县搞法西斯专政的调查	(72)
1. 上海警备区民兵工作调查组的调查报告	(72)
2. 上海警备区民兵工作组拍摄的“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的班房、刑具等部分照片	(77)

第三部分

反军乱军的阴谋活动

“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深知军队不在他们手里，就在上海搞“第二武装”，这理所当然的受到上海警备区的抵制和反对。为此，“四人帮”对上海警备区更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仅“四人帮”亲自出马以种种借口指责、训斥警备区领导同志，还唆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他们的“第二武装”搞反军乱军的阴谋活动。早在一九六九年，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就向张春桥、姚文元写小报告，诬指上海警备区路线不正，不支持他们这个“新生事物”。特别是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遥控指挥，上海的马、徐、王赤膊上阵，几次窜到警备区机关“放火烧荒”，派记者、联络员充当太上皇，煽动“第二武装”冲警备区机关大院，挑动支左人员回机关参加“运动”，纠集操纵“军内造反派”整领导，乱机关，充当内线，图谋乱中夺权。“四人帮”反党乱军妄图整垮上海警备区，搞乱南京军区的丑恶嘴脸，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一、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写信给张春桥、姚文元诬告上海警备区



影印件原文

关于改造城市民兵问题上的两条 路线斗争情况点滴反映

春桥、文元同志：

文攻武卫这支新生的工人武装，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市革命委员会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斗争，文攻武卫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原来的城市民兵。驻沪三军对文攻武卫队伍的思想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对解放军感激不尽。但是我们也发觉部分武装干部，对文攻武卫仍抱各种各样的看法和不正确的做法，甚至想以武装部代之“文攻武卫”，造成了基层工作的混乱，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对“文攻武卫改造城市民兵”的提法情绪抵触。

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工人造反报，发表了武装工人阶级，改造城市民兵的文章后，有些武装干部情绪抵触，特别对总结报告中有一段说到：文攻武卫队伍一反过去城市民兵关门训练，思想不通，认为提得太过分了，邮电系统有些武装干部表示不服气，说：这样我们过去都做错了？表示有意见。

去年年底市指挥部在东方红造船厂召开创四好誓师大会时，洪文同志在会上讲到：“……文攻武卫要代替和改造城市民兵”一段，在部分专职武装干部中反映较大，甚至有的区武装部和军管会的负责同志感到不理解，如文攻武卫第三师（邮电）工作人员金运耕同志听了报告后去向军管会汇报时，副主任刘守本（现调警备区十一师）很怀疑地说：“你为啥说文攻武卫改造城市民兵，我看不能提这么高”，“民兵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大办民兵师，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现在却提出要改造民兵，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发过通知”，要金再去搞搞清楚……。据杨浦区文攻武卫反映：最近有些没有结合的武装干部公开说：“文攻武卫提出改造民兵二个字是篡改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指示”。当“九大”林副主席政治报告中谈到要加强民兵建设的问题，有些武装干部非常活跃，连续打电话到区指挥部摸底，甚至说：“看来文攻武卫仍旧是我侬的民兵组织”（意思过去提改造民兵的说法不太妥当）。普陀区有些没有成立文攻武卫的工厂公开提出恢复民兵活动。

二、对新生事物不太支持，热衷于搞老一套。

警备区在今年二月份仍按过去原民兵系统，先后向基层武装干部发放毛泽东选集四卷（袖珍六十四开）合订本，毛主席语录，老五篇，还有宝像；甚至连没有结合的也一律照发。有些人很得意地说：“你们文攻武卫不要我参加，上级还是承认我的，我们拿的是国防经费开支，你们没有权力不承认我。”由于这样的做法在基层文攻武卫干部中引起很强烈的反映。有的参加文攻武卫工作的专职武装干

部，当时没有去拿宝书、宝像，事后还遭到武装部的讽刺挖苦。如原上海阀门厂专职武装干部梁耀春，因参加二月四日全市政治大扫除未出席普陀区武装部召开的请宝书大会，梁在二月七日去补请，该部宣传科有位戴科长就批评梁说：“你开会到文攻武卫，请宝书倒来了，你要知道，不要当二桩事，……”弄得梁非常尴尬。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已建立），警备区动员处（注：实是群工处）王处长曾召开杨浦区上柴厂、国棉十七厂、港务局的武装专职干部和区武装部长会议，讨论改造城市民兵问题，王提出了两个题目：一是文攻武卫形式改造整顿民兵；二是民兵形式整顿民兵。大家反对前一种做法，结果会议不了了之。这样的做法也引起基层思想某种混乱。大家对警备区这样做感到不理解。

有些同志到现在感情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做法仍是过去老一套。例如不管有些基层武装干部厂革会结合与否或有无问题，一律要作为文攻武卫当然代表。有些厂成立文攻武卫，区武装部成了首席代表，非到不可，最后总是指示性的讲话，使群众中产生错觉，认为文攻武卫是区武装部领导的。原邮电局人武部副部长杨作宣同志（现系文攻武卫三师参谋长），对工作人员说：“文攻武卫和武装部是二块牌子，一个班子，军管会王主任也同意我这意见，有了武装部牌子，文攻武卫牌子就不一定要了。文攻武卫三师的工作叫武装部管一管就行了，文攻武卫是过渡时期，将来还是要武装部管的……。”由于上面的这些做法也影响了基层，如原革新电机厂专职武装干部现任文攻武卫营教导员祁传忠，当区指挥部布置工作时，祁却说：“文攻武卫顶烦，你们（指区指挥部）就要结束快了，文攻武卫马上要给武装部领导了。”

三、有些参加文攻武卫工作的区武装部负责人“蜻蜓点水”，不能以身作则，甚至还有违反纪律现象。

据了解，除杨浦、卢湾两个区武装部负责人参加文攻武卫工作比较认真外，其余不少远距离遥控指挥，有的负责同志官架子没有放下来，找他们汇报工作也十分困难，如有一次虹口区指挥部有急事要请示分管文攻武卫的武装部杨杰副部长，接连打了七只电话才找到，电话里他回答：“没有意见”，事后又推翻说不同意，使工作很被动。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爱来就来，不爱来就走的情况：例如邮电局市话局武装部，群众称之“三八制”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工作不管，甚至抗议苏修游行也不搞，文攻武卫战士很有意见。

卢湾区武装部副部长孙仲良把流氓阿飞偷来的烟斗没收留着自己用，还把抄家来的半导体收音机一度放在家里收听，区指挥部一女工作人员在整风会上向他提出，还极不虚心，二次甩工作证不干了，要回武装部。公开讲：“文攻武卫工作证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我要的，回武装部我照样还是解放军。”还说女工作人员

“不尊重解放军。”要调她回厂。(孙已作检讨,态度有很大转变)

四、港务局数次发生封文攻武卫组织,军管会不加制止。

今年以来,先后在上港五、六等区,连续发生四次封掉文攻武卫组织(已启封),四月十一日又发生港务局杨站革委会、造反队、材料组、档案室、文攻武卫营被封事件。据封的人讲:“封条是在工、军宣队的接待站写的,当时工、军宣队的同志均在场,未加反对。军宣队态度非常暧昧,工宣队还对港务一师回电中讲:“群众发动起来了,封就封掉嘛!”起到了不表态的表态。直到市革会指出后做法才引起重视。据群众反映,该局军管会负责人有疏一派、亲一派的现象,这种局面尚未扭转。

五、有些区武装部对文攻武卫不放心,私下安排班子抓“权”。

据我们发现,有些区武装部对参加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事先暗底都作了分工和安排。照有的区武装部负责人说法:“党委叫我们抓一抓文攻武卫。”群众讲:“这样的核心不是斗争中形成的!”口气好象是文攻武卫的当然领导。如虹口区武装部参谋康视金在今年三月份对文攻武卫一个连长讲:“我来参加抓发展工作学习班,是我们部里(指武装部)决定的,部长要我来抓组织工作,今后文攻武卫要发枪的,我们要了解一下厂里情况,如果不了解,权在啥人手里,心中无数。部里决定郑传发(武装部另一参谋)搞政宣,杨部长(指杨杰)在区指挥部蹲点,抓全面。我们还是听部里命令……。”看来,参加区指挥部工作的每个参谋同志,武装部事先都规定了他们到文攻武卫的任务,掌管某一方面工作的。

六、在文攻武卫工作的解放军是三结合,还是宣传队一直不明确。现在不管是在市指挥部还是参加区指挥部工作的解放军,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宣传队,当当参谋”,因此调动频繁,说走就走,也很少和我们商量研究,给工作带来影响。目前,各区指挥部约占三分之一是武装部来的解放军,经常全部撤走到武装部学习一、二个星期,甚至在负责区文攻武卫干部学习班的解放军,不管工作如何重要,武装部一个命令,也不向区指挥部打个招呼,就走了,这样确实对工作极为不利。

在四月十六日,警备区刘文学政委邀请市指挥部张宝林、钟定栋、康正勤、郑惠仪及部分区指挥部工作人员(共十人左右)谈心,提意见。我们已把一般的看法作了反映和汇报,据说事后刘政委专门召开了区武装部负责人会议,要他们积极协助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做好工作。目前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们觉得在改造城市民兵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以上情况如有不当,请批评指导。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

二、张春桥指使上海民兵指挥部整理对南京军区的意见的记录

一九七四年二月份,张春桥看了上海民兵指挥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讨论情况后,要民兵指挥部整理诬告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材料,准备作为炮弹整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

这是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钟定栋记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二月十一日

秀珍同志说:党员干部会议中有关指挥部小组讨论时,联系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已悉,送春桥同志看了。春桥同志指示:请民兵指挥部那一位同志整理一下对南京军区的意见,由我们转给南京军区。

上海民兵指挥部

秀珍同志:党员干部会议中有关指挥部小组讨论时,联系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已悉,送春桥同志看了。春桥同志指示:请民兵指挥部那一位同志整理一下对南京军区的意见,由我们转给南京军区。

三、钟定栋关于王秀珍传达张春桥的意见时所作记录的揭发交代

这是钟定栋揭发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关于二月十一日记录 情况的揭发交代

1974年2月上旬,马徐王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煽动大家揭矛盾后不久,我记忆,康办值班室来电传达了王秀珍这个黑指示,我就记在信笺上,后来,领导小组决定用我和郑惠仪两人的名义整理了一份全面攻击南京军区、警备区所谓破坏民兵建设的黑材料,我积极为四人帮提供了黑炮弹,我是有罪的。

钟定栋

1978年12月2日

关于二月十一日记录情况的揭发交代

1974年2月上旬,马徐王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煽动大家揭矛盾后不久,我记忆,康办值班室来电传达了王秀珍这个黑指示,我就记在信笺上,后来,领导小组决定用我和郑惠仪两人的名义整理了一份全面攻击南京军区、警备区所谓破坏民兵建设的黑材料,我积极为四人帮提供了黑炮弹,我是有罪的。

钟定栋 1978年12月2日

四、钟定栋写信给王秀珍要求转递诬陷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的材料

这是钟定栋写给王秀珍信的影印件：

老房此件马老阅后
上海民兵指挥部把马
种送北京
北京下

钟定栋
现送二信二封
一、一份材料是郑惠仪同志和我写的有关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的情况
二、另一封信是连世玉同志写的，此人原是警备区群工处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后被整得很厉害。现调在上海县人武部当科长，因为人在基层要把信送到洪文同志手里比较困难，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所以我就为他代劳了。不知是否妥当。如行，请转交洪文同志。

钟定栋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民兵指挥部

三份附件明天再送来。
二、第一封信是连世玉同志写的。此人原是警备区群工处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后被整得很厉害。现调在上海县人武部当科长，因为人在基层要把信送到洪文同志手里比较困难，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所以我就为他代劳了。不知是否妥当。如行，请转交洪文同志。

上海民兵指挥部

送洪文同志手里比较困难，因为人在基层要把信送到洪文同志手里比较困难，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所以我就为他代劳了。不知是否妥当。如行，请转交洪文同志。

钟定栋
二月二十四日

影印件原文

秀珍同志：

现送上信二封。

一、一份材料是郑惠仪同志和我写的有关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的情况，请阅，如行的话，烦请转送洪文、春桥、文元同志阅，如还有写得不清之处请指正。另外三份附件明天再送来。

二、另一封信是连世玉同志写的，此人原是警备区群工处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后被整得很厉害。现调在上海县人武部当科长，因为人在基层要把信送到洪文同志手里比较困难，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所以我就为他代劳了。不知是否妥当。如行，请转交洪文同志。

钟定栋二月二十四日

王秀珍在这封信上批着：

请：天水同志阅。

老房此件马老阅后把写的材料送北京，此条留下。

五、钟定栋、郑惠仪送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诬陷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的材料

市委领导同志请代转

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

过去很少向领导上汇报情况，通过这次中央文件的学习，深深感到在民兵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必须结合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切实加以解决。现送上材料一份，供参阅。

上海民兵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民兵工作的形势很好。目前，市、区指挥部机关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之火，揭露了扼杀文攻武卫这个新生事物的许多事实。最近，我们也与同志们一起回顾了上海民兵六年多来的战斗历程，大家每当想起毛主席、党中央对上海民兵的亲切关怀和信任，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深感惭愧，自己的工作未做好。同时，我们也觉得上海民兵在建设的过程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很激烈。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民兵要不要改造，用什么样的路线来建设民兵。由于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反映在民兵工作上阻力不少。有些问题虽发生在下面，而责任在警备区和南京军区。

警备区和军区对“文攻武卫”这个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扼杀，是肯定还是否定？从文攻武卫改为上海民兵这一时期，有些同志的所作所为，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一、从文攻武卫成立一开始，就经历着尖锐的斗争。

1. 对文攻武卫不承认，不支持。一九六七年八月，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准，上海成立了文攻武卫。对这一新生事物，当时警备区廖政国是不支持这支队伍的。

(1)在“文攻武卫”建立时，这支队伍很需要部队支持和帮助，市革委会明确指出要警备区抓，但警备区态度暧昧，迟迟不抓，后来虽派了一些军队同志来，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宣传队”，当参谋，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们是不受市革委会统一领导和安排的，说走就走，调动频繁。不管工作怎样紧张、重要，警备区一个命令，经常全部撤走回去学习一、二个星期，对工作影响很大。警备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关于改造民兵这一指示，情绪很抵触。六八年底，洪文同志在一次大会上讲：“以文攻武卫来改造城市民兵”，有些区人武部和军队同志就十分感冒，说：“文攻武卫改造城市民兵，我看不能提这么高”，“民兵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大办民兵师，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现在却提出要改造民兵，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发过通知”。六九年三月《工人造反报》发表了“武装工人阶级，改造城市民兵”的文章后，有些武装干部更抵触，说：“这样，我们过去都做错了”，“文攻武卫提出改造民兵‘二个字’是篡改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民兵已停止活动。但是，到六九年二月份，警备区仍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老渠道”，发给原基层武装干部毛泽东选集四卷、毛主席语录，还有宝象等，甚至连没有结合的人也一律照发。在“复旧”思潮的影响下，邮电局有位人武部副部长说：“有了武装部牌子，文攻武卫牌子就不一定要了”，“文攻武卫是过渡时期，将来还是要武装部管的”。普陀区有个厂的原专职武装部长对区指挥部说：“你们就要结束快了，文攻武卫马上就要给武装部领导了”。这种流传，现在还有影响。

(2)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文攻武卫”刚成立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警备区就派了一位处长到杨浦区召开基层专职武装干部会议，向大家出了二个题目：一是用文攻武卫形式改造整顿民兵好，二是用民兵形式整顿民兵好？与会同志对警备区这种做法感到很不理解，引起了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这是与毛主席要改造民兵的指示唱反调。当浙江某地的“工人治安指挥部”撤销以后，又有人说，外地的文攻武卫都没有了，全国只有上海独此一家。有些同志曾多次说过，现在的民兵工作，沿海比内地好，内地比城市好，农村也比城市好，市区民兵工作的基础搞乱了。对这些言论，警备区有些领导同志也是应该清楚的。六九年军区特派了一位科长（已提升为副部长）来上海，名曰了解文攻武卫情况，但当他听到我们在整组时，发现个别单位的领导班子混进坏人的情况，他如获至宝，马上搞了一个《从上海铁合金厂的班子看文攻武卫队伍情况》的报告。这是对上海民兵的莫大侮辱。

2. 下面的行动，意图来自上头。据黄浦区人武部部长杨清河同志反映，七

〇年下半年，总参在北京召开民兵工作座谈会，由阎仲川主持。上海参加的有胡守富副司令员，动员处副处长杨清河和群工处刘副处长。在会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提出要恢复武装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还说，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军区很难讲话，上海警备区也为难，希望中央表个态。文攻武卫撤销后人怎么办，廖容标提出三条：（1）原来人武部来的，仍回人武部；（2）原来是专职武装干部，回厂仍当专职武装干部；（3）不是专职武装干部的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廖讲后，警备区的那位首长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就在会议期间，黄永胜提出了要“重新认识，重新实践，重新摸索”。阎仲川对廖副司令的讲话非常欣赏，会后专门发了一份简报，发至各大军区和省军区。

会议刚结束，廖容标副司令就带着任务来到上海。在浦东大楼七楼，由他召开的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并也叫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想试探试探我们的看法。廖提出，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的民兵领导机构已不适应形势，全国都是武装部，只有上海还是叫文攻武卫指挥部。还对地方同志讲，你们的工作，是可以安排的。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会上有人问：既然要我们搞民兵工作，有关民兵工作的文件为什么不发给我们时，廖副司令当面说可以可以。但是，他回去后不久，军区却又发了一个通知，凡是军内文件，地方不能看，包括文攻武卫指挥部。

二、乘“两部”合并的机会，采取种种办法搞复旧。

市委决定原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拉练指挥部合并，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在市委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城市民兵建设，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使上海民兵这一新生事物进一步向前发展。但是，事与愿违，警备区有些领导同志，乘机关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组织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都要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工作老路上去。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不胜枚举。

1. 采取“接班”、“纠偏”。七二年二月在警备区十四号楼讨论两部合并问题时，会上警备区有位副处长很激动地提出，现在各区已有武装部，又要成立民兵指挥部，就变成了二个武装机关，市区变成有二十个武装部。与南京军区怎么通情况呀？挂了民兵指挥部的牌子，实际上是解除了民兵工作，认为这个指挥部没有必要。合并报告上报警备区后，由于有些同志的抵制，迟迟批不下来，说警备区批很为难，要军区表态，一直拖了七个月合并。合并前后，警备区有些同志为了达到“接班”的目的，在搭市指挥部班子时，就说，要以军队为主，编制一共一百人，从部队调五十人，有二十四人担任组长，占副组长以上干部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七，原来地方干部一律改为副职。据有些区人武部同志反映，区指挥部合并时，群工处副处长王国兴个别向区人武部布置，“要把权抓过来，权要我们军队掌握”，“今后工作还是武装部抓的，现在就应该打好基础”，“区里的班子可照市里

办，地方同志原来是组长的，照顾历史，可做副组长”等等。在王的授意下，原来静安、虹口、长宁、徐汇、闸北等五个区指挥部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地方同志，后来都调整为三、四、五把手。当时十个区领导班子共五十六人，军队有三十五人，占百分之六十二，地方同志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八，其中产业工人很少，女干部一个也没有。在研究干部班子时，李彬山同志提出，产业工人为什么这么少？王国兴很反感地说：“这又不是搞联合政府！”。在这方面，徐汇区最为典型。这个区王国兴去过多次，活动很频繁，执行也最坚决。据反映，人武部副部长王金忠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抓过民兵工作”，“现在指挥部的权不在我们手里”，“夺了我几年的权，现在要还我权”；部长崔振兴含沙射影地说：“谁与党争军权没有好下场的”，并说：“民兵指挥部现在是过渡阶段，将来还得用专职武装干部”。他俩采用骗上压下，“架空”区委和市指挥部等手法，对民兵指挥部进行了反改造。从七二年九月至七三年八月，把敢于坚持原则的和产业工人调走了四十三人，占当时的工作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把一些思想保守，对文化大革命看法感情转不过来的人调来，象原量具刃具厂武装部长成浩英，他说：“文攻武卫如不改为民兵，我就不参加”。崔振兴却把这种人调来“整顿”区指挥部的秩序。崔振兴的问题揭露后，他的严重错误还未检查，警备区就把他调到二师去当副参谋长，群众反映说，现在是“指挥部的牌子，武装部的班子，公检法的案子，工人没有位置，走的是老路子”。由于警备区有些同志“正名”思想的影响，在学习洪文同志信时，还有人说：“我们这个机构是过渡的，以后总要解决的（指撤销），否则，要武装部干什么呢？”

2. 想方设法逐步缩小指挥部的影响。合并前，有关民兵基层的学习材料，一直是以市指挥部的名义下发的，后来除《民兵通讯》外，其他印发的学习材料一律改用警备区政治部名义下发。七二年九月编写的一本《上海民兵在前进》，参加编写的人大部分是市区指挥部抽去的，但具名却不准用上海民兵指挥部。编书如此，发文件也这样。如市指挥部早已编有《上海民兵简报》，但在七三年五月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却又编了一份《民兵工作情况》简报，直接发至各民兵师、团基层单位。再如市指挥部在去年四月十一日下发了一九七三年民兵工作计划，警备区在四月二十七日又发了一份年度计划的文件，把指挥部计划中提到的要抓社会阶级斗争的要求，大段删去。这样做，引起下面思想很混乱。对外介绍也不提民兵指挥部，例如七三年八月军区在上海召开高炮现场会，大量的筹备工作是市指挥部做的，但作为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胡守富同志，在致欢迎词时只代表警备区司、政、后，对民兵指挥部一字不提。更奇怪的是，高炮民兵是我们抓的，会议却不能参加。

3. 移花接木，组织上“架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

党”。有些区名义上说是区委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搞人武部一元化领导。比如南市区指挥部建立党支部，人武部不叫报区委批，而由人武部党委审批的。虹口、卢湾等区指挥部的党支部书记，都是人武部领导同志兼的，他们就说：“一元化领导，就是机关党支部领导”。调配干部、决定重大问题等，都由机关党支部决定后，要区指挥部领导小组去贯彻执行。警备区也是如此，如召开民兵工作或战备会议，除市指挥部去几个人外，（有些会议老百姓不能参加）区、县均由人武部参加。会议精神市指挥部只负责向机关传达，而各区都由人武部向区指挥部传达布置。这样，区人武部就成为了区指挥部的实际领导者，市指挥部也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如七三年六月十九日纪念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发表十周年，警备区召开全市民兵大会，却把指挥部撇在一边。

“两部”合并后，市委指示市民兵指挥部要把区、县的民兵和野营拉练工作都管起来。但有些同志认为，民兵指挥部是群众组织，如直接向县人武部布置工作，就变成老百姓管军队，是“不合法”的。胡守富同志也常说：“向郊县武装部布置工作，还要请示警备区”。所以指挥部不太好抓郊县的民兵工作。如在田中访华前夕，李彬山同志指示郊县要加强对沿海前沿等地警戒，防止发生意外。值班室通知各县，有的县人武部竟拒绝执行，曾先后二次来电反问：“这是那一位领导同志的指示，要讲出名字来，否则，我们无法执行”。此外，民兵指挥部还不能管沿海“民兵哨所”。七三年元旦前夕，为了加强节日保卫和战备工作，打算对郊县民兵哨所作些了解，但警备区有一位处长说：“我们已作了布置，你们不要过问了。”问题的实质，还是要不要二块牌子的问题，下面的问题是上面思想的反映。

4. 纠偏拆摊子，不要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两部”合并后，民兵还要不要抓社会阶级斗争，矛盾更尖锐了。有人认为，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是“不务正业”；还有的对民兵要长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表示怀疑，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抓一下是行的，现在还这样做，方向到底对不对头？”有一次，王国兴对徐汇区一位部长说：“治安工作（指抓阶级斗争）总要移交给公检法的。”还捏造春桥同志也有过这样的指示。在上面的影响下，有些人武部同志态度消极，据七三年七月的了解，当时十个区抓阶级斗争的有三百五十八人，而军队只有十七人。有的担任区指挥部的领导同志，长期来晚上不参加值班。原徐汇区人武部部长崔振兴公开讲，民兵“办案抓人不是方向”，“我们不能另外有一个公安局”，“先搞试点”，在“五一”节前，把指挥部作战组与公检法治安组合并。南市区人武部决定指挥部作战组一摊由公检法来接管。有些区对作战组人员进行大换班，当时十个区的三十一名作战组长，新来的就有十六人，占一半以上，其中七个区的作战组都是新手。在抓阶级斗争的三百五十八人中，只有十九人是六八年的老同志，七二年合并前后调来的有一百九十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七。由于情况不熟悉，影响了这一工

作的开展。

警备区对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这一新生事物，在舆论上不予肯定和宣扬。军区从来没有转发、交流过上海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去年六月警备区召开部队民兵工作会议，对市委提出民兵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一句也不提。后来，李彬山同志在总结发言时强调民兵要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结果在政治部、司令部编印的《民兵工作情况》上，也被一笔勾销。再如七三年七月，警备区政治部准备编写出版的上海民兵革命斗争故事二十篇，全是反映解放前历史的，文化大革命后的一篇也没有。此事我们向市委作了反映，而警备区的有些领导却要追查是谁反映的。在对待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军区的态度与警备区是一样的。几年来，我们寄给《东海民兵》反映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的稿子，从来没有发表过。而在去年高炮会议上，有份总结材料，写了高炮民兵也要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一段话，开始军区有的人坚持要删掉，提出写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就行了。由于在我们的坚持下，才保留下来。这难道也能说军区、警备区对新生事物是支持的吗？

三、由于思想和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反映在工作态度消极，撒手不管。

1. 推卸责任。去年下半年，通过学习毛主席批示，洪文同志信和春桥同志报告，广大民兵欢欣鼓舞，决心把上海民兵建设好。但是，警备区某些同志定调子、划框框，说什么民兵工作过去是“洪文同志直接抓的，李副政委具体管的，有些事也没有向我们汇报过，许多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的说：“刚刚来，情况不熟悉”，“只有农村民兵工作经验”等等。妄图把责任推在洪文同志和李彬山同志身上。警备区有些同志表面上也检查，但没有从路线上来认识问题。在一次会议上，章尘副政委讲：“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警备区犯了错误，警备区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这些二憨子闯祸，帮倒忙，使首长被动”。会后，有些同志很不服气，说：“问题是上面来的，首长不承担责任，下面提我们意见，我们好比小老鼠钻进风箱里，两面受气。”

2. 撒手不管。胡守富同志从去年下半年后，很少来指挥部，有时通知他来开领导小组会议，他也不来参加。去年九月，警备区没有和指挥部商量，就决定夏琳同志去解决七医大问题，一去不复返。

3. 消极抵制。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多次指示，郊区民兵也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但有少数县人武部就提出“五个不能抓”，没有专门机构不能抓，武装部编制人少不能抓，工分补贴没解决不能抓，没有经费、房子不能抓，与公检法认识没有统一前不能抓，消极抵制，迟迟不行动。

4. 工作上不支持，经费上硬扣。过去对民兵教育的电影一直是警备区放的，学习了一百六十二号文件后，有的同志说，现在我们才知道你们是市革委会

的一个组办，否则又要说我们的手太长了。最近，有些区、县要建造武器弹药库，哨所、靶场，原来这些经费都由警备区掌握。警备区明知指挥部没有此经费，却要指挥部解决。他们这样做会使人感到属于指挥部领导，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警备区某些同志的态度如此，那么军区又抱什么态度呢？

1. 在去年纪念“九·二九”毛主席发出大办民兵师指示十五周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刊载《办好民兵》的社论，刊登了首都、上海和天津民兵建设的情况，这对我们教育和促进很大，而军区政治部出版的《人民前线》只转载了社论，不刊登首都、上海、天津的情况，却报导了江苏其他城市召开的城市民兵工作座谈会，直到十月三日才转载北京、天津、上海的情况。军区对于《办好民兵》社论所强调的一些重要方面的问题，例如“要有计划让民兵参加社会上的各种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内。”“城市民兵要以产工人为主体的。”等等，都没有明确态度。《人民前线》报、《东海民兵》杂志为纪念毛主席“大办民兵师”指示十五周年发表的《大办民兵，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的社论，读了以后，仍使人有脱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抽象地谈战备、谈训练之感。

2. 自“九·二九”纪念活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一百六十二号文件的发表，到一九七三年年底，军区的“民兵工作简报”，共发了十二期之多，但对上海民兵，特别是对城市民兵建设只字未提，都是反映安徽、江苏和浙江省基层单位民兵怎么搞战备、训练，维护路线等方面的情况。

3. 去年十月后，各省、市和有的大军区陆续派人来沪参观检查上海民兵工作，但军区却没有任何表示，我们既没有看到有什么指示、决定之类的文件，更没有派人来上海检查和指导。据说，在此期间，军区从首长到部、科长都有人来过上海，但没有一位首长跨进指挥部的门。（即使有群工部有位科长陪同总政群工部一副部长来上海，转了几天，每到一个基层单位只是听、记、看，不表示可否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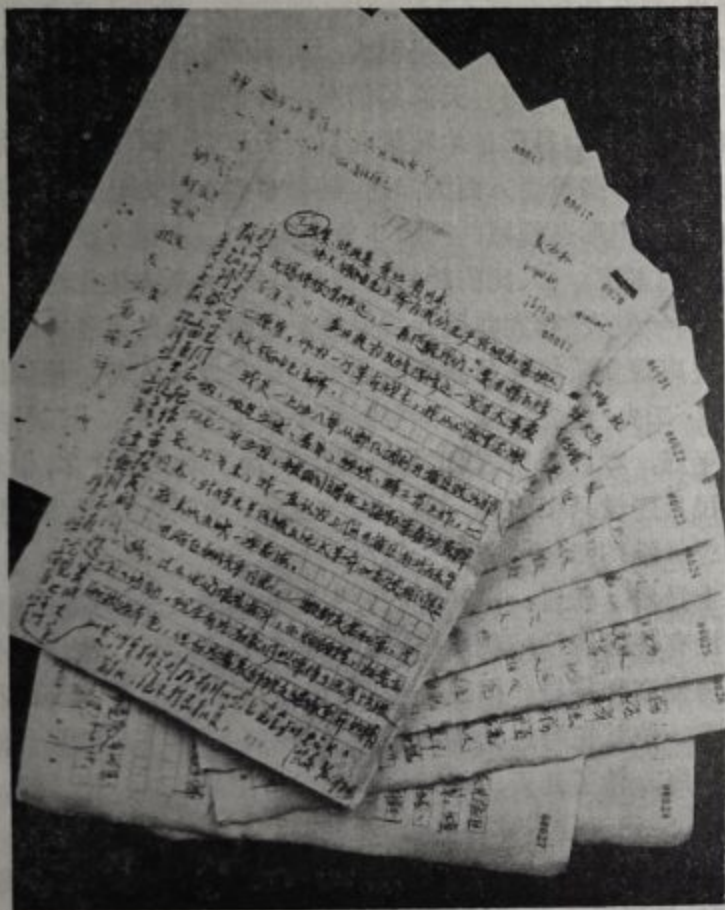
目前，机关运动尚在继续深入，同志们对我们领导这场运动不够有力，也提出了批评，同时，还要求市委和警备区党委领导同志来市指挥部检查、指导运动，看大字报。

以上认识如有不当，请领导批评。

钟定栋 郑惠仪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

六、王洪文在一封诬告信上的批语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上海县人武部原动员科长连世玉向“四人帮”写诬告信，王洪文收到这封信后毫不掩饰地说：“我收到他一封信，反映警备区的问题，到一定时候我要作为一发炮弹打出去。”下面是王洪文在这封信上批示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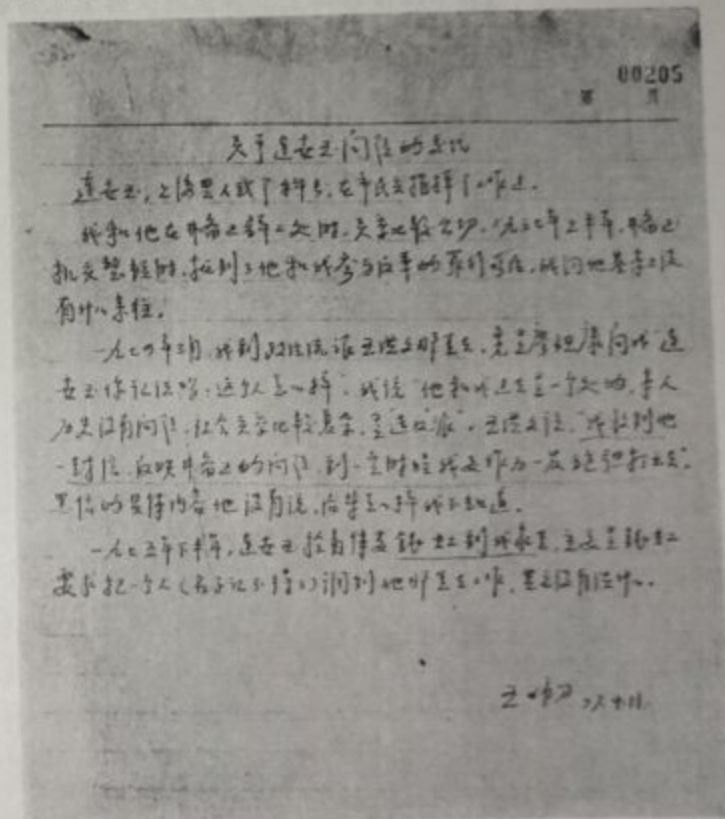
王洪文在这封信上写着：

我支持连世玉同志把你揭发的问题写成大字报贴到警备区大院去。其他同志有意见也可以写大字报贴到警备区大院去，我是警备区的一员，特别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贴大字报，绝不打击报复。

洪文 3/2 1974

七、王日初关于王洪文准备利用一封诬告信，攻击上海警备区的揭发交代(节录)

这是王日初揭发交代的影件：



影印件原文

关于连世玉问题的交代

连世玉，上海县人武部科长，在市民兵指挥部工作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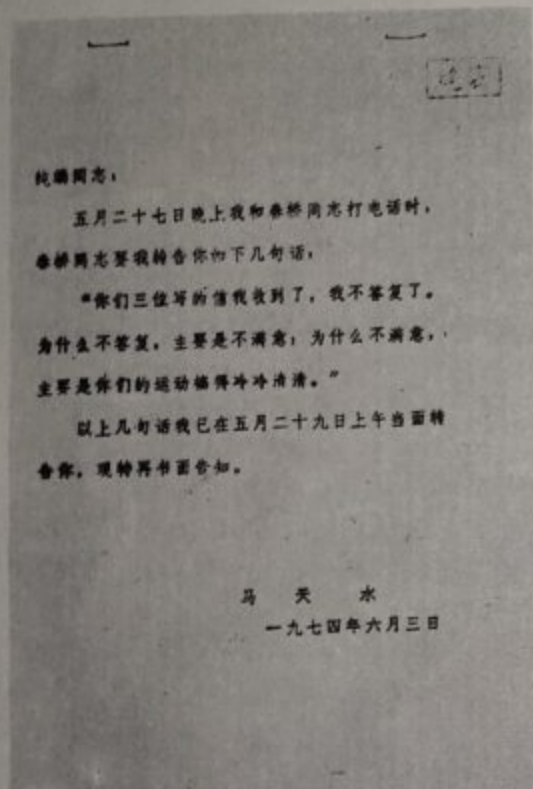
我和他在警备区群工处时，关系比较密切，一九六七年上半年，警备区机关整顿时，批判了他和我参与反军的罪行以后，我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

一九七四年三月，我到政治流氓王洪文那里去，先是廖祖康问我“连世玉你认识吗？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他和我过去是一个处的，本人历史没有问题，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是“造反派”。王洪文说“我收到他一封信，反映警备区的问题，到一定时候我要作为一发炮弹打出去”。黑信的具体内容他没有说，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

王日初 77、4、11

注：王日初是王洪文安插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一九八〇年六月正式宣布逮捕。

八、马天水传达张春桥的几句话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书面通知 (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纯麟同志：

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和春桥同志打电话时，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如下几句话：

“你们三位写的信我收到了，我不答复了。为什么不答复，主要是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主要是你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以上几句话我已在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当面转告你，现特再书面告知。

马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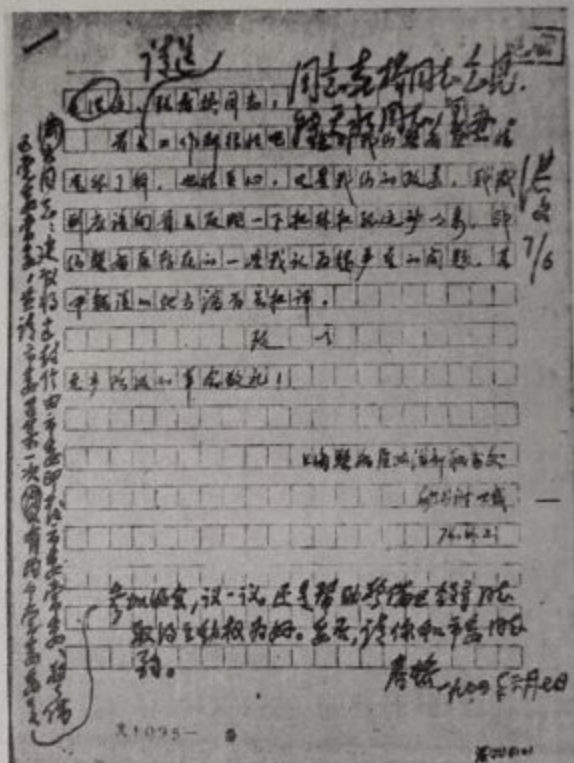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

九、张春桥、王洪文在一封诬告信上的批语

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警备区政治部一个秘书写信给张春桥、王洪文诬告警

各区领导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捂盖子”。这封信由马、徐、王立即转送张春桥。张、王收到这封信如获至宝，于六月七日就在这个信上批示，指令召开上海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大整警备区领导同志。

这是张春桥、王洪文在这封信上批示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洪文同志：建议将这封信由市委印发市委常委、警备区党委常委，并请市委召集一次有两个常委委员参加的会，议一议。还是帮助警备区领导同志取得主动权为好。妥否，请你和市委同志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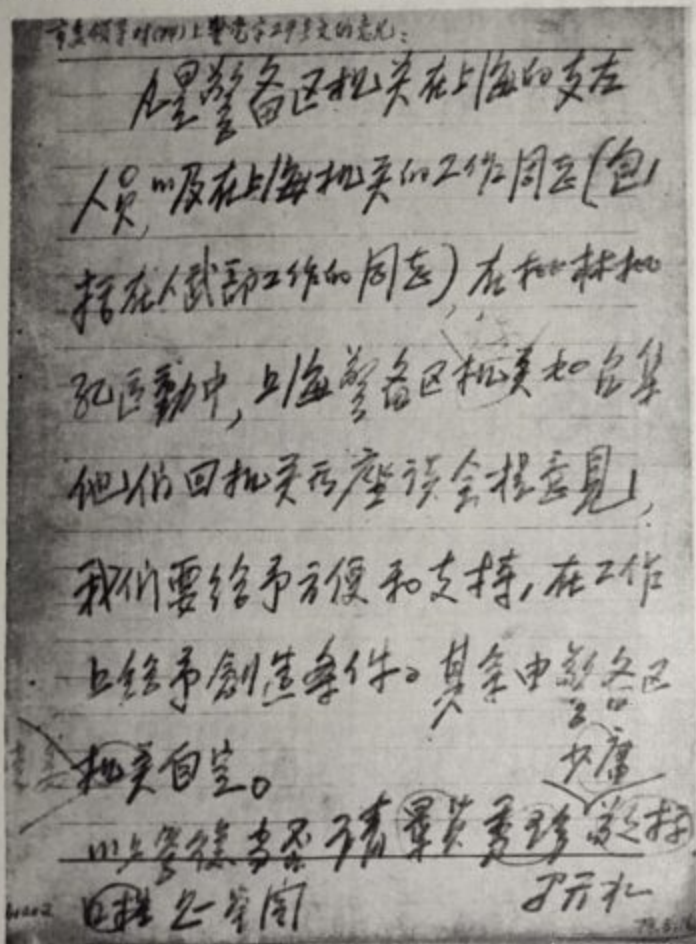
春桥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

同意春桥同志意见，转天水同志阅办。

洪文 7/6

十、马天水策动支左人员搞乱警备区字条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凡是警备区机关在上海的支左人员，以及在上海机关的工作同志（包括在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同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警备区党委如召集他们回机关开座谈会提意见，我们要给予方便和支持，在工作上给予创造条件。其余由警备区党委自定。

以上答复当否请景贤、秀珍、少庸、敬标、国柱同志审阅。

马天水

74.6.16

十一、“四人帮”驱使“第二武装”把枪口指向人民解放军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王秀珍秘密飞往北京与“四人帮”密谈回上海后，对民兵指挥部头头周宏宝说：“这场运动的阻力关键还是军队同志的思想

不通，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要提高警惕，王洪文要上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工作。”民兵指挥部按照王秀珍的意图制定了以人民解放军为对象的《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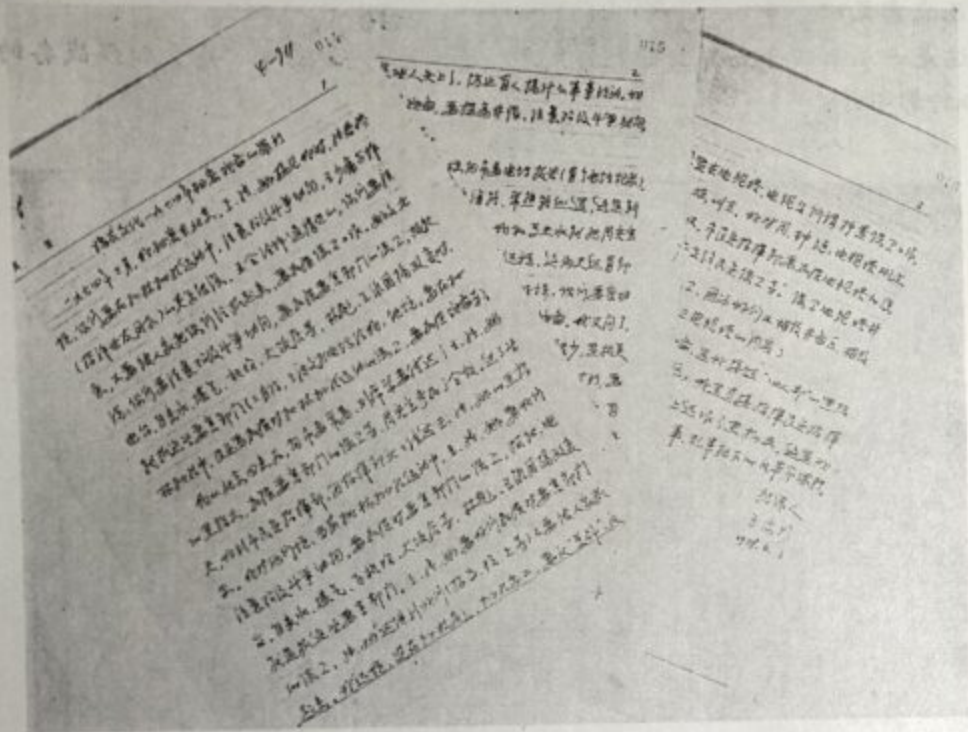
这是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打印上报的《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的影印件：



王秀珍在这个“意见”上批示：拟同意，要切实有人抓。（指挥部）要抓落实。

秀珍 4/5

十二、王秀珍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次“秘密战备”问题的揭发交代(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揭发交代一九七四年秘密战备的罪行

一九七四年三月，我秘密去北京，王、张、姚接见我时，张春桥说：你们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注意阶级斗争动向，王少庸与许（指许世友同志）的关系很深，王会给许通情况的，你们要注意，不要被人家把你们给抓起来，要加强保卫工作。姚文元说：你们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要加强要害部门的保卫，报社、电台、自来水、煤气、机场、大饭店等，林彪、王维国搞政变时，就抓这些要害部门（二月份，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他说：要在批林批孔中，民兵要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保卫，要加强战备等）。

我从北京回来后，向市委常委、列席常委传达了王、张、姚的黑指示，加强要害部门的保卫等，周宏宝参加了会议。过了些天，我到市民兵指挥部，向指挥部头头传达王、张、姚的黑指示。我对他们说：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张、姚要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要加强对要害部门的保卫，报社、电台、自来水、煤气、飞机场、大饭店等，林彪、王维国搞政变就是抓这些要害部门。王、张、姚要我们加强对要害部门的保卫。张、姚还讲到我们（指马、徐、王等）不要被人

家抓起来。我还说：现在批林彪、批孔老二，要反“复辟”、反“倒退”，要批到某些人头上，防止有人搞什么军事行动，我们民兵指挥部要加强战备，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要保卫批林批孔运动等。

在这以后，周宏宝、钟定栋向市委电话报告（有个电话记录），反映警备区有很多辆摩托车在淮海路、常熟路巡逻，这是新动向。马天水也看到了这个电话记录。我和马天水就把周宏宝找到康平路学习室，听周、钟汇报。钟还说：这两天还有部队小分队巡逻情况反常，从来没有过的。我说：你们要密切注意警备区的动向，我们民兵指挥部要加强战备。我又问了，市民兵指挥部夜里有多少人值班？钟说：值班人很少，是机关干部值班。我又说：光机关干部值班不行，要有民兵值班才行，要加强战备。马天水也说：民兵指挥部要加强民兵战备值班，有什么情况民兵能起作用。在我们的指使下，市民兵指挥部每夜有几十人在指挥部值班。有一天夜里，我在市民兵指挥部检查值班情况。我对值班的民兵说：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斗争很激烈，你们要保卫好批林批孔运动，保卫好民兵指挥部，不要被人家（指警备区）把指挥部老窝给端了。我对钟定栋等人说：市民兵指挥部有民兵值班就好了，有什么情况就主动了。

四月，我和徐景贤去电视塔、电视台所谓检查保卫工作，我们把周宏宝，钟定栋叫去，我对周、钟说：电视塔刚建成，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市民兵指挥部要加强电视塔的保卫。徐景贤也说：“电视塔交给民兵保卫等。”保卫电视塔警备区早已布置部队日夜保卫，因为我们不相信警备区，相信“第二武装”（战备方案里有保卫电视塔的内容）

七四年民兵这次秘密战备，是我按照“四人帮”的黑指示，矛头针对警备区和南京军区，我是直接指挥民兵指挥部头头干的，我在秘密战备方案上还作了黑批示。这是我参与“四人帮”利用“第二武装”反军、乱军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犯罪人 王秀珍 1978.4.3

十三、钟定栋炮制《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过程的揭发交代

“四人帮”和马徐王1974年4月份搞的一次战备，完全是提防警备区，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

1974年2月马、徐、王利用批林批孔名义大整警备区后，他们做贼心虚，在四月份提出要加强战备（当时没有突出的敌情）。当时，周宏宝从市委开会回来后，传达了王秀珍的指示，说：要指挥部搞一个加强对康平路、机场、电台等重要目标的保卫方案，范围越小越好。当时，我也没有告诉作战组的同志。周要求选择一些在九、十两次路线斗争中有战斗力的单位（实际上能听指挥，对“四人帮”有感情的），我是积极紧跟的，根据这些意图亲自做了方案，并布置了长宁、杨浦、徐

汇、静安等区指挥部选择了十多个单位，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意图，（国棉四厂、十七厂、三十厂、中纺机、电缆厂、5703厂、港务局，4046公司、上无四厂、量具厂和上海县靠近机场周围的几个民兵团等单位，值班民兵近万人，各种武器5000余件）周宏宝和我还撇开了区，直接到了一些厂去检查，搞得非常神秘，非常紧张，有的厂结果子弹都放在弹夹里，区里对此也很有意见。我们对胡副司令、夏副主任根本不信任，他们是领导成员，但这个方案根本没有送给他们看，周就亲自带到了市委，王秀珍在这个方案上还作了黑指示，“拟同意，要抓紧落实。”4月29日，徐景贤、王秀珍带了周宏宝和我又亲自窜到电视台、电台（徐未去电台）既检查了通讯设备，又十分露骨地说：现在中央领导同志（指王、张、姚）很关心电台的保卫工作，9·13事件前夕王维国就妄图占领电台搞反革命政变……，并对刘象贤说，今后有什么情况要多与民兵指挥部联系，就是不提警备区，不提解放军。“五一节”前夕，周宏宝从市里开会回来又紧急布置要组织二个连队的民兵（400人）枪弹配套，在五一节加强机动值班，并指定放在外滩和万体馆方向。因为，当时时间比较仓促，把徐汇区正在拉练途中的队伍中抽调200余人

星夜赶回安置在徐汇区委四楼待命，杨浦区从4805工厂调了200余人的一个连队，放在黄浦路20号待命。马徐王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罪恶目的和意图是十分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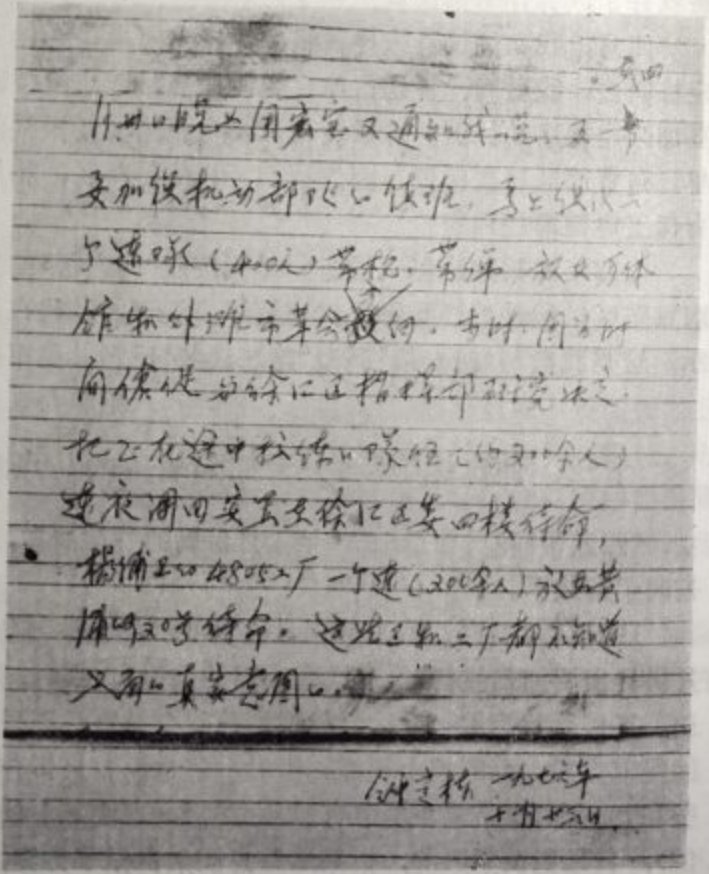
摘自钟定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的揭发交代

十五、钟定栋关于一九七四年四月的“战备行动”是针对上海警备区的揭发交代

右面是钟定栋揭发交代（节录）的影件

影印件原文

在四月三十日晚上，周宏宝通知我说：“五一



节”要加强机动部队的值班，马上组织二个连队（400人）带枪、带弹，放在万体馆和外滩市革会方向。当时，因为时间仓促与徐汇区指挥部研究决定，把正在途中拉练的队伍（约200余人）连夜调回安置在徐汇区委四楼待命，杨浦区的4805工厂一个连（200余人）放在黄浦路20号待命。这些区和工厂都不知道上面的真实意图的。

钟定栋 1976, 11, 23

十五、马天水关于反军乱军的揭发交代

“四人帮”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代表者，他们利用民兵武装为他们“四人帮”服务。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自知力量薄弱，需要有军队的力量，在中央抓不到军权，他们就在地方抓军权。张、王对上海警备区党委采取又打又压的分裂主义政策，妄图拉住地方部队为他们的罪恶目的服务。借批林批孔的机会，张、王直接指使我们大整警备区的领导。我们也积极跟着干了。七四年两委会整得周司令心脏病发了。直到今年，王洪文还说过，周司令靠不住。李宝奇同志到警备区以后，王洪文一再问李宝奇政委怎么样，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不怎么样。在批林批孔中，还指使我们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干扰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因为南京军区和警备区领导对他们有所警惕，他们拉不到解放军，这样“四人帮”就更控制民兵，他们将民兵自立系统，还企图吃掉武装部。我在这方面作了他们的帮凶。对这一点，去年王洪文来上海时，在一次黑会上说：“现在军委要把民兵置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过了二十年之后，我还是要把这支民兵队伍拉起来的。”他拉民兵干什么？不是妄图利用这支队伍为“四人帮”阴谋服务吗？“四人帮”，特别是王洪文对民兵武器的制造和装配，极为关心，经常过问和督促，这是有他的罪恶阴谋的。我在这方面也很起劲，积极当了“四人帮”的帮凶。

马天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

十六、徐景贤关于反军乱军的揭发交代

我紧跟“四人帮”，进行分裂党、分裂军队、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非常错误地把“四人帮”看作左派，看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把他们攻击的人，看成是右派。我的立场错了，是非颠倒了。张、姚、王在我们面前攻击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是经常的。我们听了以后，也跟着攻击。王洪文调中央以后，曾经多次来上海，包括陪外宾来沪在内，他几乎每次都要在我们面前攻击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攻击中共中央有关部和国务院有关部的领导同志，还攻击各兄弟省、市、区的领导同志。这些恶毒攻击的内容我正继续写成书面材料上报。

批林批孔期间，张春桥、王洪文又鼓动我们直接插手军队，他们作了所谓批

示，要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常委联合开两委会，揭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问题，我是最积极的打手之一。在他们指使下，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经常单独接见军队所谓一种观点的同志，实际上就是跟市委、跟张、姚、王跟得最紧的几个负责人；另外我们还在某些秘密的点里接见部队的同志，进行煽风点火。我们几个人根本没有军职，却插手军队，手伸得这样长，而且还直接到警备区去看大字报。一面看大字报，一面点警备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名。在警备区的群众会上，我还说了“南京军区的某些领导人一贯正确的神话破产了”这种话，实际上我公开的把矛头指向军区的负责人，完全把自己凌驾于大军区之上。直到前不久，我还插手军队，以个人名义送材料，想要揪军内走资派。这样就进一步地分裂了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徐景贤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

十七、王秀珍关于反军乱军问题的揭发交代

交代我执行“四人帮”黑“指示”进行反军乱军的罪行

在市委召开的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我揭发和交代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今天，我再补充揭发“四人帮”反党乱军，分裂军队，妄图篡军夺权，毁我长城的罪行。在这方面，我也紧跟“四人帮”，执行他们的黑旨意，犯有严重罪行。我向警备区的领导和广大指战员同志赔礼道歉，低头认罪，我完全接受章副政委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揭发批判，诚恳地接受同志们对我的严重罪行的揭发批判。下面交代我是怎样执行“四人帮”的黑“指示”进行反军乱军、分裂军队，破坏警备区部队建设的严重罪行：

一、交代我是怎样接受“四人帮”关于反党乱军的黑“指示”的。

对于上海警备区，“四人帮”早就有看法，张春桥说什么：“他们（指警备区领导）不承认我是政委，好多事情不让我知道，不过是要我敲敲‘图章’”。在“四人帮”长期毒害下，在我思想上就逐步形成了凡是拥护“四人帮”的，就是“乱军”派，是“革命”的；反对“四人帮”的，就是“稳军”派，就是“老保”。认为警备区领导是“稳军”的掌权，“乱军”的“挨斗”，总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警备区的这种状况反过来。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到处煽风点火，阴谋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夺权，上海警备区也是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重点。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我到北京去，从二十日到二十三日这三天中，王洪文断断续续同我谈过一些话，他大肆攻击解放军，大放乱军的谬论。他说什么“军队里九、十次路线斗争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总政、总参、总后，二炮、装甲兵、炮司等单位，盖子都没有揭开”，“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揭开，人换了路线没有换，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变。”还说什么“中央的态度是支持广

大革命群众（他说的‘中央’实际是‘四人帮’）。领导去点火，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有的小干部当面指着司令说：‘鄙视你这个司令’！我批了铁道兵的一封信，那里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当时，我也汇报了警备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说：“张宜爱、李彬山很着急，他们认为警备区的运动没有动。”王洪文就说：“你们不要着急，上面问题不解决，下面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说什么“你们要多做周司令的工作，有的情况他并不了解，有的他也不了解真实情况，如果真实情况了解了，他会跟毛主席的（这是反话，实际是指会跟‘四人帮’的）”。妄图分化瓦解警备区的领导，篡夺领导权。接着他又说：“我有炮弹，没有放”，“有位同志写的信在我这里，要看什么时机转下去放火”。他要来信的同志把“信的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出去，贴到警备区”。张春桥也说：“我也有不少信，没有批，等机会批下去。”王洪文、张春桥这些黑话的中心内容，就是要我们把警备区搞乱，而且要把重点放在警备区的领导，把领导机关搞乱，把领导干部搞垮，就可以从乱中夺权。我接受了这些黑“指示”，急急忙忙在三月二十五日赶回上海，向马天水作了汇报，也把精神告诉了张宜爱、李彬山，积极贯彻这些黑“指示”。

同时，新华社有两位记者到市委来汇报，说：“这次我们是中央政治局派来的，我们的任务重点是在军队。来前，江青、姚文元还接见了我们，江青还表扬了福州军区的一个新华社记者，说他敢闯敢冲，冲破层层阻力向中央反映了情况。”（给他们反军乱军鼓气）还说：“他们写的情况可以不受省市、军区的限制，可以直寄中央”等等。我们听了，心中更加有底，就更加卖力地去贯彻“四人帮”反军乱军的黑“指示”了。

二、交代我怎样组织人贴大字报，把火从外面烧到警备区里面去的。

中央文件规定是不准串连的。但是我们认为警备区机关里面多数是“稳军”派，乱不起来，要从外面组织力量，把火从外面烧到里面去。首先，我与马天水、金祖敏借到指挥部宣布领导班子为名，实际上去煽风点火，要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大字报贴到警备区去。临走时，还拉了周司令一块去，目的是想逼周司令表态。我们看了大字报，开了大会，我在会上放毒说：“大字报质量都很高，要将大字报打印出来细细看。”我鼓励他们把大字报送到警备区去张贴，我还说：“运动刚开始，发展不平衡，可能还会有阻力，不要怕，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能深入下去”。煽动他们乱军，给他们鼓气。同时，我们（马、徐、王）还要新华社记者、市委联络员到警备区去摸情况，物色“积极分子”，要他们煽动一些地方支左干部和复员转业人员送大字报到警备区去，使警备区机关乱起来，好实现“四人帮”篡军夺权的阴谋。

三、交代我怎样按照张春桥、王洪文的黑“指示”，召开两个常委联席会议，整警备区领导的。

当火从外面烧到警备区机关时，“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炮弹可以放了。于是连续来电话，发“指示”，公开点火。五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打电话给马天水，说什么对警备区的运动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主要是你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五月三十日，王洪文又作“批示”，对警备区领导施加压力，胡说什么“警备区党委早就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领导机关的阶级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接着在六月七日，张春桥、王洪文抓住政治部一个秘书的来信，这次揭发出来我才知道这封信就是有人策划炮制的，蛮横指责“警备区领导捂盖子”。他们指使我们“召集一次有两个常委委员（市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一议”，胡说什么“帮助警备区领导同志取得主动权为好”。实际上是要我们搞突然袭击，施加压力。大整警备区领导，把警备区搞乱。从六月十日到十二日，连续开了三个半天的会议，我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整了周司令、刘政委和章副政委等同志。我无理地指责三位领导，攻击他们“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力”，污蔑他们“保错误路线是很得力，捂盖子很得力”。由于我们围攻周司令，致使周司令心脏病发作，我对不起三位领导和同志们，我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低头认罪。

在两个常委联席会议上，我们曾举某某为例，为什么部队给他两份不同的鉴定，说明警备区的路线有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以人划线，因为他写大字报批警备区领导，因而我们就认为他是乱军的，“觉悟高”。后来，我还要总工会把他从上海无十九厂调到工人文化宫工作。

周司令生病住院后，我们（马、徐、王）商量，认为不能把警备区已经点起来的火熄下去，于是由马天水出面通知警备区“要刘耀宗政委继续负责抓警备区运动”。实际上，我们知道刘政委领导运动有困难，我们通过张宜爱、李彬山事先商量好了运动打算，让他们到警备区党委常委会上提出来，形式上通过一下而已。我们逼警备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组织了一些同志进行揭发，进一步煽动警备区机关乱起来。在扩大会议结束以后，我和徐景贤还赶到新华社社去探望“揭发问题”比较积极的同志，表扬他们“三个半天大会开得很好，北京几位领导听了很高兴，可惜没有录音，录音了更高兴”。为他们“乱军”鼓气，我还指着张宜爱、李彬山说：“这是你们的挨斗司令，乱军政委”。我这些话，完全是分裂警备区，把矛头指向主要领导同志的反动言论，起了很坏的作用。

四、交代我到警备区机关煽风点火，指使人往南京军区送大字报的。

“四人帮”通过我们，不仅要搞乱警备区，夺警备区的领导权，而且要把南京军区搞乱，进一步篡夺南京军区的领导权。王洪文在一次电话中就暴露了他要搞乱南京军区的阴谋，他说：“南京运动没有搞开，总参有位同志送了一张大字报退回去了，为什么不能送大字报？上海能送。”马、徐和我商量以后，决定到警备区去看大字报，借机煽风点火，发动乱军串连活动。事先，马天水已布置张宜爱、

李彬山要准备送南京军区的大字报，但没有确定什么时间送。我们先后到警备区看了两次大字报。在第二次看大字报时，机关已经乱起来了，有些大字报已经点了南京军区某些领导同志的名。我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幸灾乐祸地感到十分高兴，我一边看大字报，一边乘机做工作，进行煽风点火。我对一位副政委说：你鼻子好了么？”表面上是关心他的病，实际上是要他提高“嗅觉”，投入“斗争”。同时，我又直接布置有的支左干部，要他们赶快派人往南京军区送大字报，说什么“越快越好”。马天水要他们“不要请示，突然送去，进不去，可以冲进去”。我还说：“警备区不让报车费，到市革会来报”。七月二日，我们听到送大字报的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就连夜秘密接见，听他们的汇报，赞扬他们“冲南京军区，冲得好，打开了南京军区的缺口”。并要他们准备第二批大字报，企图把炮弹再往南京军区放，进一步把南京军区搞乱。

五、交代我策划支左干部回警备区机关，企图进一步分裂军队，搞乱警备区。

当警备区乱起来后，张宜爱、李彬山一再反映机关“积极分子”少。我们（马、徐、王）也感到内部力量不足，认为在地方支左的干部“造反”精神足，想方设法要把他们弄回机关去，这样好串连，把机关搞得更乱。开始，我们商量，“要警备区向市委写个报告”，“对回机关参加运动的问题，分几档，每档提出办法来”。张春桥感到这样太露骨了，没有同意。后来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以市委名义通知各组办“凡是警备区机关在上海的支左人员以及在上海地方机关工作同志（包括在人武部工作的同志）”回机关参加运动，“要给予方便和支持，在工作上给予创造条件”。我还特地布置一位同志，要他去做支左干部的工作，要他们回机关去揭矛盾。我还布置他到人防办公室去揭盖子，把陈博同志撵走。

对于警备师，开始时乱不起来，我就要支左的同志回到师里去做工作，竭力让警备师也乱起来。当二师师部开始乱起来的时候，我幸灾乐祸地说：“二师形势很好，我表示祝贺。”这说明我根据“四人帮”黑“指示”，要把警备区机关搞乱，也要把下面的师团搞乱。我是有罪的。

六、交代我怎样对警备区领导进行排队，又打又拉，分裂军队的。

“四人帮”张春桥、王洪文在警备大搞以人划线，拉一批人，打一批人。我们也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嘴上，我们讲要批判“稳军”“乱军”的提法，批判以人划线的口号，实际上我们干的是乱军，做的是以人划线。谁能乱军，我就和谁亲，就当作依靠对象；谁是稳军，我就认为是：“老保”，就要打。在这次运动中，我们根据王洪文定的调子，把警备领导分成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

我们心目中的依靠对象，就是张宜爱、李彬山，因为他们听“四人帮”的话，听我们的话。

我还认为，张宜爱长期在郊区组支左，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我们，他经常向我们反映警备区的情况，南京军区开了什么会，能把会议材料送给我们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整。因而我们对他有好感，叫他“挨斗司令”。

还有李彬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总司支左过，听说在部队受压，没有实权。思想上同情他，行动上支持他。就把他们当作警备区的主要依靠对象。因此，我同李彬山接触多一些。特别在批林批孔以前，他有时来找我，反映他在警备区受歧视、排斥。还说什么，他对警备区机关的干部班子很不满意，认为干部处是章尘副政委控制的，干部配备是由某某安排的。我就给他“鼓气”说：张、王两位对你是信任的，你在警备区受气，就把屁股坐到民兵指挥部去。有几次，他向我反映民兵指挥部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我要他多做点工作，在几个领导成员中多起调节作用。

关于杨新亚，开始，我们认为他是南京军区派来的，是周司令带来的人，对他是有戒心的。一九七四年他到北京军政大学学习回来后，态度有改变，写了大字报，我们就拉他，对他有好感。只要有机会，我总要接近他，甚至在飞机场迎送外宾时，我总要找机会和他谈几句，问问他身体怎样，工作怎样？

王洪文对我们说：“周司令、章副政委、胡副司令、孙副司令都是南京军区某某派来的。”因而我们对周司令不信任，认为“王洪文做了那么多工作，也没有做过来。”我们对周司令没有当作市委书记看待，有些材料，象整中央和外地有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不敢发给他，怕泄露出去。为了控制警备区，我还出过坏主意，要马天水兼政委。去年开人大常委会会议时，我曾经对张春桥建议说：“我们在警备区又没有军职，最好叫马天水兼政委。”张说：“没有用，我们也是政委，还不是敲敲图章。现在的班子还可以，再来的人不一定比现在好”。当我讲到刘耀宗政委要求调走时。张说，警备区的班子问题，你们商量个意见看，刘调走提谁？周司令身体不好，同意让他休息。对张春桥要我们“商量个意见”的黑“指示”，我回上海后对马天水说过，但后来没有进一步研究、落实。

对章尘副政委，我们认为他是南京军区某某派来的，活动能力强，抓实权。过去军区某某部长来上海，章副政委经常跑延安饭店，搞了干部名单，这个人就要整。

对孙子宇副政委，我们认为他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反反复复，群众意见大，也是要整。

对王枚副政委，王洪文说他在总参表现坏，也是整的对象。

因此，马天水打电话给李彬山，布置了重点整的对象是章尘、孙子宇、王枚三位副政委。后来，我们进一步分析，认为孙子宇副政委的问题都是第九次路线斗争中的老问题，意见大主要是些过去挨过整的同志，机关多数同志并没有什么

意见；王枚副政委刚来上海，大家不了解情况。因而把重点整的对象集中到章尘副政委一个人头上。从党委常委会整到扩大会议，再从扩大会议整到常委会，妄图把章副政委整服。

虽然，我们按照王洪文的黑“指示”，定了重点整的对象，但是在王洪文关于“警备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要将第九次路线斗争问题翻过来”的黑“指示”影响下，实际在警备区打击了一大片，差不多的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主任、部长，甚至有些处长都点到了名，挨了榔头，吃了棒头。比如对邢浩同志，我在马、徐面前讲过邢浩同志的坏话。对此，我要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低头认罪。

李宝奇政委来上海后，我们（马、徐、王）在背后也议论过。我听王洪文说过：“李政委是某某某同志带去的。这次来上海是邓小平派来的”。我在背后散布过李政委的流言蜚语，讲他表面上尊重市委领导，实际上还是搞他一套，不大好相信等。我要向李政委赔礼道歉，低头认罪。

七、交代我怎样搞特务活动的。

“四人帮”派新华社记者、市委派联络员到警备区了解运动情况，实际上是按照“四人帮”和我们（马、徐、王）的指使去插手运动，掌握情况的。除了记者、联络员，我们还背着警备区党委，通过张宜爱、李彬山进行单线领导，掌握警备区的运动。警备区的运动部署，往往是我们事先商量好，通过他们来贯彻执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躲在幕后，有些时候工作做不过来，我们（马、徐、王）也赤膊上阵。如运动开始时，我们到机关来看大字报，秘密接见“积极分子”；在运动后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后，王洪文感到警备区的运动再不收场，就要暴露“四人帮”乱军篡军的阴谋了，慌忙打电话来，要我们赶快转弯，说：“你们要学习中央17号文件，”“人家检讨了，要鼓掌表示欢迎。对警备区的运动在国庆节前要解决掉，不要再乱下去了”。还说“就说是我王洪文说的，周司令他们检讨也好，不检讨也好，不能揪住不放。”我们布置联络员去做工作，但这时火烧得正旺，做不过来。没有办法，我们（马、徐、王）只好亲自出马，在某某招待所，以及延安西路二百号，召开秘密座谈会，分别接见部分在外支左的和机关干部，要他们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赶快转弯。在这个会上，我们丝毫没有承担我们煽动他们乱军的责任，因为这些同志是在我们的煽动下写大字报，向警备区领导开炮的，所以罪责在我们身上，不在这些同志。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承担责任，相反，我还责备他们是“极左”、“偏急”，是“一次革命论”。我还以一贯正确自居，教训他们说：“冲冲杀杀是比较容易，掌握政策就比较难。”还说：“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要他们“团结大多数”，“会内促会外，会外促会内。”后来，我们到警备区机关开座谈会，我还按照王洪文讲的，在章副政委发言后，带头鼓掌。

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告一段落，记者、联络员撤走了。但是我们分裂警备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仍旧通过张宜爱、李彬山掌握警备区的情况。我们（马、徐、王）找李政委谈话，事先总要和张宜爱、李彬山谈话。马天水还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干涉警备区领导的分工，要张宜爱管作战，李彬山管干部，杨新亚管警卫，目的是要让我们信得过的人掌握实权。我们还给有些同志转过信。我还要一位同志到征兵办去摸外地来上海招兵同志的动向。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

下面我再交代我们怎样做周司令秘书的策反工作的。因为我们对周司令不放心，总想了解周司令的态度，我们就做周司令的秘书岳道培同志的工作。开始，我对岳秘书并没有好感，我还对办公室的同志说过：“岳秘书是周司令的亲信，是南京带来的，你们的口齿要紧一点”。批林批孔运动中，岳秘书的态度有些转变，他写了周司令的大字报，又表示不愿给周司令写检查。有次，我到医院去探望周司令，听说岳秘书不愿给周司令写检查，我说：“你要帮周司令写检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嘛。”慢慢的，又通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有马天水的秘书分别对岳秘书做工作，主要是廖祖康拉他。大概周司令也发觉我们在拉岳秘书，提出不要秘书了，并安排岳秘书到五七干校去学习。这时，岳秘书来找马天水的秘书。我们（马、徐、王）商量后说：“他工作蛮好”。准备给警备区打个招呼：仍旧要警备区把岳秘书安排在机关工作。后来，这件事被廖祖康知道了，由廖祖康出面报告王洪文，说“由岳秘书兼管王洪文在警备区的文件”，就这样把岳秘书留下了。此后，他到康平路来拿文件，碰到我，我总要问问他周司令的情况怎样？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以后，周司令在杭州休养。有一次，我碰到岳秘书，就要他到杭州去看看周司令，我说：“你去看一看周司令身体怎么样？看一看思想情况怎么样？想回来吧？并代我问好！”周司令到庐山去休养，我也问过岳秘书情况。其实“代我问好”是假的，要他去了解周司令的行动，摸周司令的态度是真的。我对周司令和岳秘书采取特务行为，我有罪，我向周司令低头认罪。

另外，我们和张宜爱、李彬山一起议论过后勤部长的人选问题。有次李彬山对我们提出：“后勤部长黄波副司令长期生病，要配一个部长”。按理说：这是警备区党委的事情，我们不应干涉。但是我们在一起排了排，当时考虑不出适当的人选，提出过好几个名单。最后，我们说：“某某某同志还可以”。至于后来搞的七十八人的“升官图”，我事先确实不知道，是张宜爱、李彬山他们搞的。事后，有人揭发了这件事，我们派人查了这件事，我说，这不是成了“造反”做官了吗？关于要有几位同志列席部党委，这是我们（马、徐、王）同意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我和徐景贤还到三连去活动，向他们送了有关批邓的资料和报社印发的通讯员材料。我还煽动他们到好八连，到复旦大学去串连。我说，“你们在市委机关站岗，我们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你们可以到八

连去学习，他们是怎样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还可以到复旦大学去看看，他们是怎样批邓的。”实际上，我是鼓动他们去串连，是想把连队搞乱。

还有一次，在毛主席逝世后，张宜爱向马天水和我反映黄涛有个女儿在一〇九医院工作。她胡说什么：“上海的唁电所以短，是因为写的时间早。”意思是毛主席还没有逝世就写好了。我们听了很生气，这不是造谣么？马天水和我找了张宜爱，要他向李宝奇政委汇报，马天水还要他到医院去查一查，要狠批一下。后来张宜爱找了后勤党委，向医院党委问了情况，并且来问我们怎么处理。这时，我们又换了调子说：“你们教育教育，批评批评罢！”实际上，因为她是黄涛的女儿，就教育教育算了。换了其他人，那我们就会挥舞大棒，大追大查了。

八、最后，我揭发交代在民兵工作中是怎样另立系统，搞“第二武装”的。“四人帮”早就野心勃勃，阴谋篡夺军权。江青早就叫嚣：“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啊？”“等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军装，再戴上红星”。王洪文也恶毒地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四人帮”拼命想在军队里安插一些人，安插不进去，就想极力拉起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说过，建立民兵指挥部“不是一个随便什么形式的问题，而是根据整个战略来改变和确定形式。”“四人帮”极力反对警备区和区、县武装部来管民兵的日常工作，我也是赞成的。

特别是在去年九月，“四人帮”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以后，王洪文窜来上海，加紧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有一天，他找我们（马、徐、王）和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开了个黑会，会上他说：“同志们要清醒，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作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能站得住”，“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二十年后我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他改过来。”在这次谈话后，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私自下令在上海搞区、县人武部和指挥部、人防办、征退办的“四部合并”的试点，对“四部合并”我是积极贯彻推行的。后来，由于在试点过程中，反对的同志多，“四部合并”工作难进行。我领会“四人帮”搞“四部合并”的要害是吃掉人武部，于是我建议“四部合并”两步走，先搞“二部合并”，经报告王洪文同意后，马天水和我就做民兵指挥部领导成员的思想工作，在上海县和杨浦、卢湾两个区搞了“两部合并”的试点，一下子砍掉了人民武装部。我紧跟“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自成体系，破坏毛主席亲自创立的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打着市委“直接领导”的幌子，否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否定警备区和区、县人武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阴谋搞“第二武装”，妄图把民兵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武装，我是有罪的。

另外，我在民兵指挥部还制造谣言，挑拨关系，破坏军民团结。我曾对周宏宝说过：“胡守富副政委（副司令）是跟周司令来的，你们要注意。”我对施尚英说：

“上海民兵是张春桥，王洪文搞起来的，过去的民兵是‘老保’。”还说什么：“路线斗争很复杂，对部队的同志要注意。”同时，我们按照王洪文要牢牢控制民兵指挥部，以便一旦有事，“队伍可以拉得出，指挥得动”的黑“指示”，我要民兵指挥部多办一些工人学习班，多选一些干部，充实到市、区民兵指挥部，把一些不听“四人帮”指挥的同志撵走。这是我忠实执行“四人帮”的黑“指示”，要把民兵领导权牢牢控制在“四人帮”手中，竭力排斥、破坏上海警备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关系。

“四人帮”竭力贬低和诋毁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恶毒诬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军队革命化建设的大好形势，肆意践踏毛主席关于“党指挥枪”的建军方针，反军乱军，制造分裂，丧心病狂地破坏军队建设和民兵建设，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搞垮，毁我长城。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紧跟“四人帮”，反军乱军，分裂军队，破坏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攻击迫害警备区的领导同志，干了不少坏事，也害了一些同志，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警备区在三支两军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积极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支持上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总司成立后，同警备区的关系很好，得到了警备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那时我们住在警备区，生病住八五医院。但是，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挑拨，慢慢地对警备区产生了看法，关系疏远了，把警备区的多数领导同志都看成是“保”的、“右”的，一直到批林批孔中大肆反军乱军，分裂军队，犯了严重罪行。这一切，总根子都是“四人帮”。现在，敬爱的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挖出了反军乱军的毒根，大得人心，大快人心，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也挽救了我。我决心彻底揭发“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军乱军的阴谋，同时，彻底清查自己的罪行，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坚决站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八、张敬标关于反军乱军问题的揭发交代：

揭发“四人帮”及马、徐、王分裂军队的罪行。这方面我也有罪行。

“四人帮”自知篡党夺权必须手中有军队，他们要尽阴谋诡计，妄图分裂上海警备区。马、徐、王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对警备区的干部排了队，分成可靠的和不可靠的。他们经常鬼鬼祟祟找警备区个别领导人摸情况，交“底”，搞阴谋诡计。尤其是借批林批孔的机会，大整警备区的领导同志，在一九七四年的一次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常委的两委会上，把周司令整得发了心脏病。对那些所谓可靠的人，他们秘密接见，煽风点火。一九七四年夏季前后，马、徐、王亲自去警备区

看大字报，要下面“揭发问题”，并表态支持一部分人，煽动一些支左的解放军和复员、转业的同志贴警备区的大字报。马、徐、王为了掌握军队运动情况，还派去新华社记者和市委联络员，硬要他们不通过军区，直接到警备区摸情况、作汇报，整理黑材料。他们对南京军区，更是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极力污蔑、攻击。马、徐、王经常散布××军区某某政委是邓的亲信、不可靠，军区派来警备区的某某某是他们那条线上的，等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马、徐、王组织煽动警备区的某些人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并挑动说：“你们去南京送大字报，车费警备区不给报，我们给你们报销。”对于支左的解放军同志，他们认为不可靠、信不过、看不中的，就排挤回去。几年来寻找各种借口，把可以安置在地方工作的支左人员，就绝大部分被调走了。市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仅仅因为她爱人的父亲是在某某部队后勤部工作的，他们也“不放心”，把她撵出了机关。

一九七四年春季，王秀珍、黄金海、陈阿大、某某某等人一起去江阴张家港看上海建的码头，我也去了。在回来的路上，王秀珍突然提出要去南京看大字报，了解情况。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上海的汽车牌照，王秀珍叫人将烂泥涂掉她的车牌号“08”。到南京已是深夜九点，王先去她的一家亲戚（在南京部队工作）摸了情况，然后匆匆看了大字报，第二天凌晨偷偷溜了回来。由于她心怀鬼胎，在大桥宾馆院内不敢下车。回来的路上，王秀珍还一再叮嘱大家和司机同志：“千万不得向任何人说，要绝对保密。”

在分裂军队的问题上，我是积极参与的，凡是“四人帮”马、徐、王信得过的和所谓“左派”我就支持、信任。而他们认为不可靠和信不过的，我也就对这些人有看法。尤其表现在一九七四年那次市委常委、警备区常委的两委会上，我配合了马、徐、王攻击警备区党委在干部路线上犯了错误，颠倒是非地指责警备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实行打击、压制和排斥。起了恶劣的作用。有次我跟马、徐、王去警备区，当他们大肆攻击南京军区和警备区的某些领导同志之后，我又从旁策应，偷偷地对警备区某个领导同志说：“市委几位领导的讲话很重要，这是领导的爱护，你要转过来，表个好态。”企图拉拢这位同志，分裂警备区。我还派人调查了解部队农场土地、上交粮食数量、和天马山采石场出卖石子等方面的情况，向马、徐、王汇报，为“四人帮”攻击部队提供了炮弹。另外，马天水、王秀珍曾对我说：“某某饭店是外地在上海的联络站”，我就根据他们的交代，多次打电话给某某饭店，要他们报送来往住宿的负责同志名单，借口是以便市里领导同志前去探望，实际是掌握部队的情况和动向。我所有这些作为，都是非常错误的，是有罪行的。

张敬标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

十九、李彬山关于反军乱军问题的揭发和交代

早在一九六八年，王洪文就向我说什么，李副政委，你要说话，军队内部的问题，应该斗的就要斗。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在上海市革会一次碰头会上说，军队没有搞“四大”，这是一个缺陷，这一课还得补上。同年的夏天，我去向张春桥反映党委对传达北京办班的精神，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范围大一些，有的主张范围小一些，我认为范围大一些，对消除“两个错误口号”的流毒和影响有好处，但军区领导同志主张小一些。在我讲了这些之后，张春桥说，你们几个（上警、舟嵎、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我建议搬到中央去办的，现在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希望你们不要摇摆。我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挑动下，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补上“四大”这一课，才能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为要端正路线，就必须坚持斗争。几年来，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终于使自己背离了毛主席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发展到跟随“四人帮”和马、徐、王在军内干尽了坏事。

（一）在批林批孔中，跟着“四人帮”和马、徐、王背离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伟大战略部署，卖力执行“三箭齐发”。

“四人帮”和马、徐、王在批林批孔中所干勾当的揭发。

1. 利用矛盾，拨弄是非。一九七四年五、六月，王洪文在一封所谓群众来信上写道，警备区早就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开。张春桥异口同声地说什么警备区早就应该争取主动。这些所谓批示，是他们篡军乱军，乱军夺权的罪恶行径，我不仅没有识破其阴谋，而紧步了他们的后尘。

2. 制造舆论，蛊惑人心。徐景贤一会儿说，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一贯正确的神话，已经破产了。一会儿又对警备区一些（指后去的）领导同志说，你们是带了什么感情，接受什么任务来的。王秀珍在警备区机关看大字报的过程中，见到这个说，你们要主动，见到那个说，你们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极尽他们（造谣）之能事，煽反革命之风，点反革命之火。

3. 纠集力量，内外结合。马、徐、王惟恐力量不足，达不成“四人帮”推行“三箭齐发”的任务，他们除派记者、联络员，掌握了解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凌驾于警备区党委之上，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外，利用周纯麟同志有地方职务（市委书记）之便，组织转业军人（如陈预森、顾维善等）向市委、市革会送大字报。要市民兵指挥部打头阵，支持市民兵指挥写大字报，把矛头指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搞所谓揭发批判南京军区领导和上海警备区领导不支持上海民兵，不承认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合法地位，不支持新生事物，等等。责令警备区领导同志到市民兵指挥部看大字报，逼迫表态支持。责令在外支左和在民兵、人防系统的原

警备区机关人员，一律回机关参加运动，挑动群众斗领导，群众斗群众。

4. 亲自参加批斗会，极力出谋献策。马、徐、王为了紧跟“四人帮”实现篡军乱军的罪恶阴谋，亲自召集批斗会，亲自召集所谓积极分子会，亲自参加座谈会，亲自参加群众性的大会，亲自出面作黑指示。据我所知，从六月上旬到九月下旬，他们亲自主持召开的会议，计有七次（一次市委常委会，一次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会、两次既有领导又有群众的会，三次所谓积极分子的黑会）之多。一方面向一些领导同志施压力，企图逼人认错，市委常委会和两个所谓常委会就是这样做的。一方面了解情况，研究斗争方法和斗争重点，以周、刘、章作为斗争重点对象，就是徐景贤、王秀珍在新华社召开的黑会上确定下来的，所谓既要防止过右，又要防止过左，就是马、徐、王在丁香花园的黑会上所作的黑指示。

5. 为求发展，又施一计。马、徐、王惟恐乱的不够，在上警的篡军乱军的反革命之火，被点燃之后，就明确指出，要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据汪洋向我传达说，王秀珍讲，浙江省军区已向南京军区送过大字报，上警没有送，我们落后了，要马上组织力量，向南京军区写大字报，送大字报，配合军区机关，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

6. 基于形势发展的趋势，组织体面的收场。马、徐、王可能在“四人帮”的暗示下，预知毛主席“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即将发表，运动拖延下去，难以奏其反革命之效。他们说王洪文要他们转告警备区领导，要学习中发17号文件；马天水亲自打电话向我说什么，你们对章尘不要这样斗了，这样斗法，不是成了逼、供、信吗！在周纯麟同志检讨后，催我表态欢迎，王秀珍打电话向我说，周司令已作过检讨，据说还不错吗，你应该赶快表态欢迎。我说，我准备表态的。王秀珍又问我说，你准备怎样表法？我说，一分为二嘛。徐景贤担心我达不到目的，接过话筒向我说，你讲一分为二，应该肯定主流，要多肯定好的方面。我根据徐、王的黑指示，赶写了一份发言稿，经过他们审定作了表态发言。在我发言之后，一些“积极”分子，颇为反感，说什么你转那么快，不是要把我们摔死了吗，要对我进行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景贤等人，又亲自出面，召集积极分子开黑会（我没有参加），作解释。马、徐、王还以开座谈会的方式，对所谓犯了错误的同志，在谈到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时，带头鼓掌，欢迎改正错误。警备区六位（周、刘、张、杨、章和我）到军区参加批林批孔会议前，他们搞专门接见，在接见中，王秀珍说什么，希望你们几位同志，团结起来，努力作战，不要被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可见“四人帮”马、徐、王的反革命手段，何等毒辣。

我在批林批孔中的所作所为。

挑动民兵指挥部和人防办的群众，把矛头指向警备区。为了适应所谓斗争的

需要，紧跟马、徐、王搞纠集力量，内外结合，在市民兵指挥部和市人防办，利用矛盾，煽风点火，运动群众起来打头阵。为掀起写大字报的高潮，我在两个单位都说过什么，你们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管什么人，包括我在内，不怕官多大，都要敢于斗争。在静安区民兵指挥部周天明向市指挥部送了大字报之后，我立即召集了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提出了要表态支持。我之所以这样说和这样做，不是为了引火烧身，而是为了引火烧别人。在市指挥部是为了烧胡守富、阎波和王国兴同志，在市人防办是为了烧朱万国同志。通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达到把斗争锋芒指向警备区领导的目的。当不少群众起来写大字报的时候，市人防办有人揭发我批了人防经费和材料，给部队做防空掩体，朱万国同志到市人防工作，我未表示欢迎，我为了达到预期目的，我违背毛主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导，一面向群众抛出批示，证明给部队做人防掩体的经费、材料我是不同意的，而是朱万国同志在我未同意之后批给的。一方面向群众讲，朱到人防办工作，仅是周司令向我讲过，市委并没有正式通知，更没有明确职务，叫我怎样宣布。我已请他正式主持会议，在人防工作会议上讲话，可算已经有了表示。由于我采用了以上的卑鄙做法，运动了群众，结果把矛头引向了朱、胡、阎、王等同志，而且使阎、王两同志面对面的被批斗，同时也把斗争锋芒引向警备区主要负责同志。从而发展到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军内军外人员，向警备区送大字报，干扰了运动有秩序地进行。

参与向军区送大字报的活动，把矛头引向军区。我在汪洋传达马、徐、王授意要向军区送大字报以后，错误地认为，上海警备区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同军区有着密切联系，两个错误口号起源于军区，批判两个错误口号的阻力，又是来自军区，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也同军区有联系。如果军区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势必影响上警问题的彻底解决。因而，我就一呼即应。为了抵制廖容标副司令，在估价民兵工作时，讲的“城市不如农村，纵深不如前沿”。我向军务动员处调阅过总参民兵工作会议简报，在查了没有文字根据后，我向民兵指挥部的同志说，简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提法，即使要批的话，不能同黄永胜所谓三个重新（重新估价、重新认识、重新研究）相提并论，以免混淆矛盾。我还把简报给周宏宝、施尚英等同志看过。对于向军区送大字报的组稿，审稿，我记得我没有参加，但在一些人起程向军区送大字报之前，他们在市民兵指挥部集中时，我向送大字报的同志讲过话，把我上面对送大字报的错误认识，向大家作了倾吐，并且还说了什么，大字报要贴在能使大家看到的地方，不要叫贴那里就贴那里。要要求首长接见，还要附带了解军区运动的情况。送大字报的同志回沪后，曲增言、高松等人向我和汪洋等人，谈过送大字报的情况，讲了怎样进军区大院，怎样贴大字报的，讲了首长接见时，并不是那么热情，既没有表示欢迎，也没有明显反对，

但也讲了你们有意见，要写大字报，可以寄嘛，不一定要这么多人来送等等。讲了据他们观看，司令部没有看到有大字报，政治部也廖廖无几等情况。后来有人（可能是高松）提出要向警备区党委汇报，我们认为首长们接见时的讲话，似较冷淡，如果向警备区党委汇报，不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可能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就没有支持他们再向警备区党委汇报。后来军区十一月召开批林批孔会议，丁盛对上警小组的同志说，你们送的那批大字报，当时要他们贴在房子内，他们不同意，被风吹雨打弄掉了，很可惜，现在还在多好呀。在丁的触动下，我向周、刘、张、杨、章说，听说还准备了一批没有送，是否请示市委一下，要不要再送，后经秘书请示，回答说，马天水讲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形势还好，不必再送，方作罢休。

李彬山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

二十、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白国良在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发言

揭发“四人帮”及其上海一小撮余党 反党乱军的滔天罪行

白国良

今天，我怀着无比强烈的义愤和深仇大恨，愤怒控诉揭发“四人帮”和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马徐王利用新华社记者，大肆破坏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疯狂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滔天罪行。

批林批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竭力干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我在他们的控制和利用下也干了大量的坏事，犯了罪。从一九七四年二月到十月，短短八个月内，马徐王为了反军乱军，同我们记者接触、开黑会有十八次之多，其中有四次是单独“召见”记者。现在，我根据马徐王十八次同我们接触、开黑会的事实，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揭发他们反党乱军的罪行。

（一）“四人帮”和马徐王，上下呼应，密谋策划，向记者面授机宜，把记者推向第一线，大搞反党乱军。

一九七四年一月，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北京办了批林批孔记者试点学习班。当时，分社派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四人帮”利用这个学习班，向记者面授反军乱军机宜。叛徒江青，在这个学习班上，气势汹汹地要记者下去

向部队领导“开炮”，要记者“勇往直前，绝不回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要记者象杨子荣那样，深入所谓的“敌人”的心脏。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指令记者，有些材料和信件可以直接寄给他们。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煽动记者要有所谓“反潮流”精神，“不要怕打击报复”，“中央支持你们”。他所说的“中央”，就是王张江姚的“帮中央”。他们深怕记者不理解他们反党乱军的这套黑话和阴谋，当场疯狂恶毒地攻击部队领导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人帮”还指派他们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鲁瑛，到学习班向记者传授反革命经验。这些家伙无耻地为叛徒江青吹嘘，说什么“江青亲自写信抓连队，连信皮都是亲笔写，这同江青亲自抓样板戏一样，也是反潮流”；他们还说什么，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第一次对记者提出较高的“要求”，给记者的“权力”也最大，等等，拚命鼓动记者为“四人帮”反军乱军的阴谋效忠卖命。

上海的马徐王对“四人帮”反党乱军的阴谋心领神会，上下呼应，串通一气。我们一回到上海，他们就连续七次，以“召见”记者或让记者参加会议为名，效法他们的黑主子在北京学习班的那一套，向记者进行反革命的“示范”。特别恶毒的是马徐王把记者挂上“中央特派记者”的牌子，推向前台，为反军乱军疯狂地做一系列的反革命准备。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晚上，在康办小休息室。我和另一个记者从北京回到上海，刚下飞机没有几小时，徐景贤就通知我们两个记者和分社社长一起马上去向他“汇报”北京学习班的情况。过了几天以后，徐景贤已经住进医院，又特地把我们分社社长和另一位记者叫到医院去，向他详详细细“汇报”北京学习班情况，以便根据他的主子的旨意，在上海周密策划反军乱军的阴谋活动。

在向徐景贤“汇报”以后不久，马徐王召开组办负责人会议。为了把记者推向前台，他们别有用心地吹捧我们两个记者“是中央派来的”，还说什么“记者来上海是中央对上海的关怀”。当有人提出这是上海分社的记者时，王秀珍连忙说：这同分社记者不一样，他们是“中央特派记者”。徐景贤在会上表演得淋漓尽致。他把记者的名字怎样写也介绍了一番，而且要各级党组织向记者“开绿灯”，向记者提供所谓“方便”。特别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马天水作了总结以后，竟然一反常态，当众征求记者对会议有什么意见。当众给我们挂上“中央特派记者”的招牌，把记者推上反军乱军第一线，充当他们反军乱军的打手。这次会议之后，在全市层层传达了上海分社有“中央特派记者”。从此以后，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人到上海分社来找我们两个所谓“中央特派记者”，甚至远在浙江的东海舰队领导机关也有人来找我们。来人当中有些是告黑状、写黑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党乱军分子。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们个别接待告黑状、转黑信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为“四人帮”和马徐王提供了大量反党炮弹。

在这以后，马徐王反党乱军已经选择好了以警备区为突破口，在三月份短短的几天内，两次单独“召见”分社社长和我们两个试点记者，具体部署反军乱军。马天水公开叫嚣：“警备区领导机关是重点，要把重点摆在这里。”他还说，“警备区有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解决。”王秀珍布置我们先从警备区机关外面搞串联、拉队伍、收集情报，把火从外面烧到警备区机关里面去。她还当场开了一批名单，叫我们作为“依靠对象”，其中就有张宜爱、李彬山、王日初等十二人。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恶毒诬蔑“延安饭店是黑俱乐部”，攻击部队同志在延安饭店“搞特务交易”，要我们到延安饭店去搞情报，说什么“能从延安饭店搞到一些情况就好了”。会后，我们按照王秀珍开的名单找人谈话，搞串联、拉队伍，为他们收集反军情报。

还有两次，马徐王在驻沪三军领导同志汇报批林批孔会上和市委常委学习中央十七号文件会上，点了三军的名，定了三军的罪。马徐王要分社社长带我们两名试点记者参加以上两次会议。老奸巨猾的马天水攻击警备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要警备区联系两个“否定”，还要联系“干部路线”。他还恶狠狠地指着海军领导同志说：“你们那里家属宿舍有人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不检查？”他所谓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四人帮”。王秀珍接着也恶毒地咒骂“这是解放军的耻辱”。这伙人还说“空军也有问题”。徐景贤紧跟着也叫嚷，警备区要联系领导干部的实际，要“矛头向上”。他在会上狂叫：“警备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究竟解决了没有？解决得怎样了？关键就在这里。”他张牙舞爪地叫嚷：“警备区是有大是大非问题。”他恶毒攻击警备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至今没有肃清。责骂警备区“有事情不向春桥报告，以后明确春桥当第一政委也不报告”。这完全是以帮划线、结帮篡党的反革命谬论，其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在过去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下了丰功伟绩。徐景贤胡说什么警备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执行的一条“错误”路线至今没有肃清，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丧心病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根本不批林、不批孔，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部队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妄图搞乱军队，毁我长城，居心何等险恶。

(二)“四人帮”幕后操纵，马徐王赤膊上阵，控制和利用记者，搞乱警备区。

马徐王为了从警备区打开一个缺口，极力煽动和组织反军乱军分子到上海分社搞串联。王秀珍甚至亲笔写信介绍人来找我，要他跟我好好“谈一谈”。就是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反军乱军活动，直到“四人帮”垮台前夕，还给江青写“效忠信”，要张春桥当主席。反党分子王秀珍对这样一个坏家伙，还在信上祝他

身体健康，真是反动透顶！马徐王阴谋策划，把我们的分社实际上变成了他们反军乱军的一个黑联络点。六月四日，警备区政治部有一个干事跑到分社来找我。他给反革命黑帮张春桥、王洪文写信告黑状，攻击警备区领导批林批孔运动“捂盖子”，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对这封告黑状的信我是有罪责的。我当时鼓励他，支持他，并且给他出主意进行修改。黑信转到马徐王手里以后，马徐王很快就转上去。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如获至宝，六月四日写的黑信，六月七日张春桥、王洪文就写了黑批示，指令召开上海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来整警备区领导，并要马天水来办这件事。主子一声令下，马徐王倾巢出动，并把张、王黑批示和告黑状的信搞成影印件，广为散发，大造反革命声势。

六月十日到六月十二日，马徐王根据张王的旨意，召开了三个半天两委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马徐王伙同他们在警备区的黑枪杆张宜爱、李彬山等一帮人，穷凶极恶，大打出手。他们用张春桥、王洪文的黑批示，大整特整警备区的领导同志，逼着警备区的首长一个一个检讨。由于这种残酷的法西斯迫害，会议开到最后一个下午，竟把周纯麟司令员整得当场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万恶的“四人帮”和马徐王借一封告黑状的信，对警备区领导同志采取这种阴险狠毒的手段，完全暴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对人民解放军的刻骨仇恨，他们是一伙披着羊皮的豺狼，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两委会结束以后，马徐王马上把反军乱军的鬼火从外面烧到警备区领导机关内部。六月十六日，马天水亲自下令给各组办，说什么：凡是警备区机关在上海的支左人员，以及在上海机关工作、包括在人武部的人员，要为他们回警备区机关参加运动给予“方便”和“支持”。第二天晚上，就由他们的黑枪杆张宜爱、李彬山等人窜到我们上海分社，密谋策划，组织人在第二天人武部座谈会上，向警备区领导搞突然袭击，强迫警备区召开军人大会，传达张、王黑批示，煽动群众搞乱警备区机关。这是一个大阴谋。我在这次密谋策划的黑会上，积极支持了张宜爱、李彬山的这个阴谋，为他们撑腰打气。十八日座谈时，完全按照预定的阴谋冲了这次会，逼迫警备区领导召开军人大会。

十九日，马天水为了实现搞乱警备区的阴谋，亲自部署军人大会的规模、内容和方法。他亲自规定什么“这个军人大会要让人武部和在地方支左的同志以及机关的同志能来尽量来”，还要大会传达张春桥、王洪文的黑批示，为“四人帮”大整警备区领导制造反革命舆论。当时，警备区主持党委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开大会还有困难。马天水居心险恶地指令警备区党委，要让“新华社记者做工作”，而且要党委把大会的发言名单也要和我“商量”，叫我参加审查、修改发言稿。

“四人帮”和马徐王诡计多端，为了反军乱军，在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向警备

区派了两个所谓“市委联络员”。对这次军人大会，他们通过联络员给记者传来黑话，说什么“要注意多找一些警备区机关内部在职在位的人到大会上发言，而且最好还要有个把中层干部，不要形成大会发言者都是机关外的人”。当时，我就和两个联络员按照马徐王的黑旨意，积极物色发言对象，替他们修改发言稿，煽动警备区机关内部的人在大会上“放炮”。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军人大会召开了。为了把记者推向第一线，诡计多端的张宜爱和李彬山，竟把我拉到主席台正中去坐，要我控制会场。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羞愧痛心，我怎么能坐在这个位置上，狂到如此程度！

第一天会议结束，马徐王就急急忙忙叫联络员通知我们两个记者和张宜爱、李彬山去康办开黑会，对第二天下午如何继续召开军人大会进行策划。这是马徐王为反军乱军与我们记者的第九次接触。当时，马天水听了联络员汇报第一次军人大会的情况后，表示很满意。接着他又出了一个鬼点子说：“你们再找一两个中层干部上台发言”，并且说“大会中间最好休息一下，免得影响效果。”反党分子王秀珍还要张宜爱、李彬山两人故意表现一下“高姿态”，叫他们在大会上作一些“自我批评”来骗取群众。

大会开到第三天下午，本来按预定计划要结束，但有人提出这个大会继续开下去。这时候，一个联络员就偷偷地溜出会场，直奔康办向马徐王“请示”怎么办。过了一会，他就打回电话给另一个还留在会场的联络员，传来马徐王的黑指示说“大会不要再开下去，下午就结束”。这个联络员听完电话，马上告诉了我们两个记者，还通过张宜爱、李彬山的嘴巴，向警备区党委提出休会的意见。所以，军人大会只开了三个下午就休会了。

军人大会休会的当天晚上，反党分子徐景贤和王秀珍得意忘形，亲自出马窜到上海分社来“接见”他们的黑枪杆张宜爱、李彬山和警备区的一些人，表示“庆功”，继续给他们鼓劲。当时徐景贤还洋洋得意地说：“这次大会使警备区一贯正确的神话破产了！”王秀珍也手舞足蹈地说：“可惜这次大会没有录音，否则可以送到北京让中央领导同志听一听。”她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他们的黑主子“四人帮”。徐景贤阴险毒辣地说，“看来突破比较艰苦，我们脑子里要考虑更大的战斗”。

三个半天的军人大会，是“四人帮”及马徐王搞乱警备区的一个重大罪证。大会的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我在这次大会的前前后后，忠实执行了马徐王的黑旨意，起了很坏的作用。

军人大会以后，马徐王继续兴风作浪。他们在警备区根本没有军职，却以警备区太上皇自居，把警备区党委撇在一边，在警备区机关食堂私自召集群众开会，大放厥词，对警备区的领导同志扣帽子、打棍子，煽阴风，点鬼火，并且明

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挑拨部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干部战士中制造资产阶级派性，破坏部队的安定团结，搞乱机关的运动。

八月三十日晚上，马天水和王秀珍把我和另一个记者叫到康办，教唆我们进一步大搞反军乱军勾当。马天水恶狠狠地说：“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警备区党委有些人“不转过来，就跟他斗，斗到底，斗到他转变”。还说批判什么人“要有策略”、“要有准备”、“要有灵活性”。马天水说，象司令部斗了某某主任，对象是选对了，但会前没有准备，就打不好仗。马天水教唆记者和联络员要采取“个别谈话和大小批判会相结合，看看怎么有利，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候顽固的要狠批。不同情况、多种方式。光有积极性高还不够，还要提高水平”等等。直到临走时，在康办休息室门口，马天水还摇头晃脑地再三嘱咐我们，在警备区要打头阵，“继续发动群众”，“火力要猛”，“该批评谁、欢迎谁，态度要鲜明，以争取更多的人。”王秀珍也大发谬论，教唆记者“不要操之过急，要讲究效果，做过细的工作”。她还胡说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刚露头，激烈的还在后头”等等。在他们的指挥下，我在警备区到处煽风点火，鼓动群众写大字报整警备区的领导同志，损害了部队首长的威信，打击了革命的老干部。

在这同时，“四人帮”和马徐王控制我们分社，极力策动和指挥记者收集军内情报，并且作为记者的任务强令完成。在“四人帮”和马徐王的一再授意和指使下，我们打着“中央特派记者”的金字招牌，以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从驻沪三军那里盗窃了一千多份文件、材料，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其中有不少材料由我们编为《内部参考》报道，为“四人帮”提供了反党炮弹；有的送到马徐王手里，被他们作为整警备区领导的黑炮弹。如警备区有一个干部，党委已决定他复员回东北原籍，他跑到分社来找记者告黑状，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现在复员回原籍是“打击报复”。我们不仅错误地支持了他不走，而且向王秀珍汇报。反党分子王秀珍就抓住这件事作为整警备区领导的黑炮弹，逼警备区党委撤销原来的决定，把这个人留在上海工作。这不仅严重践踏部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破坏了部队铁的纪律。这是“四人帮”及马徐王破坏党、瓦解党、以帮代党、反军乱军的又一铁证。

(三)“四人帮”和马徐王阴险毒辣，野心勃勃，把反军乱军之火烧向南京军区，妄图搞乱南京部队。

“四人帮”和马徐王从批林批孔一开始，就朝思暮想从警备区打开一个缺口，把反军乱军的火烧到南京军区，一步一步把南京军区搞垮。马徐王多次露骨地煽动说：“警备区的根子在南京军区”。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徐景贤、王秀珍窜到上海分社，就曾经当着警备区的一些人公然叫嚣“要解决路线斗争，代表人物不在警备区”，赤裸裸地煽动警备区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果然，在徐景贤讲了这

黑话以后没有几天，马徐王就精心策划，组织了警备区一些人到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大字报从内容到标题都是马天水亲自审定的。他还交代送大字报要“保密”，以便来个突然袭击，使军区措手不及。后来马徐王得知那些送大字报的人不仅向警备区报了名单，还领了路费。这使惯于搞阴谋诡计的马徐王十分恼火，暴跳如雷，马徐王竟然恶毒咒骂这些人没有“骨气”等等，真是反动透顶！在这之后，马徐王贼心不死，还准备再煽动和组织一批人，甚至鼓动高级干部也去南京军区送大字报。

七月中旬，马天水、王秀珍知道我们要到新华社南京军区记者组去了解情况，走之前，他们特地把我和另一个记者找去，布置我们到军区为他们收集情报。王秀珍还叫我们到南京部队空军领导机关去抄一个军长的大字报。我们在南京军区住了几天回来以后，马天水和王秀珍就迫不及待地叫我们去向他们汇报。甚至，在医院里生“偏头痛”病的徐景贤，也把我们两个记者叫去向他汇报南京军区之行。在医院里，徐景贤听得津津有味，从床上爬起来，在病房里手舞足蹈，一点也不象有病的样子，并且向我们透露，南京军区领导同志的材料多得很。

到九、十月间，马徐王在搞乱警备区之后，就密锣紧鼓地连续四次开黑会，进一步加紧策划把斗争矛头指向南京军区。这同“四人帮”妄图利用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由他们来“组阁”，妄想“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是紧密配合的。

九月九日晚上，马徐王在招待所“接见”警备区一些人，要我们记者也去参加。张宣爱、李彬山等都去了。马天水居心叵测地说：“警备区形势很好，在军队系统搞到这样程度是不错的，对全国会有影响。”就在这个黑会上，马徐王阴险地作了新的反革命部署，要大家对警备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再狠狠地整一下，然后集中火力，攻南京军区。

接着，九月二十日晚上，在延安西路一个会堂，徐景贤、王秀珍又召集警备区机关一些人开黑会。在会上，王秀珍妄图用被他们整过的警备区领导干部去攻击南京军区，借刀杀人。徐景贤唯恐大家领会不了他们的反革命策略，解释说，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语道破了这伙反革命黑帮妄图毁我长城的狼子野心。他们要尽各种卑鄙手段，对军队领导干部必欲打倒，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必欲搞乱毁掉才称心。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和马徐王是隐藏在革命营垒内部的“蛀虫”，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派，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正是一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到九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三日晚上，马徐王又接着两次开黑会。这次他们把警备区机关内外的一些人都召到一起来，要大家不要再揪住警备区的领导同志不

放，“警备区的运动到此就可以了”。

当时，我由于没有能领会他们“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还支持警备区一些人贴领导的大字报。马徐王发现后，气急败坏地立即向张春桥告黑状。没有几天，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就出面亲自下令给新华社总社，要我在一天之内立即撤出警备区。

从以上他们密谋策划的事实证明，万恶的“四人帮”和马徐王是破坏警备区、南京军区批林批孔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哪里是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他们哪里是在批判孔孟之道？他们批林批孔是假，反党乱军是真。他们是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行篡党夺权之实。“四人帮”和马徐王竭力吹嘘他们是“反林英雄”、“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等等，完全是弥天大谎！他们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黑帮，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过去，我受了万恶的“四人帮”和马徐王的毒害，在他们的控制利用下，做了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搞乱了部队，错误极其严重。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挽救了我，擦亮了我的眼睛，使我看到了万恶的“四人帮”反党乱军的真面目，使我重新回顾了反军乱军中所做的坏事。每当想起这些，我感到万分痛心，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对不起警备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同“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作坚决斗争，同他们划清界限，彻底决裂。我恳切地希望军队的首长和三军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我的罪行，帮助教育我改正错误。我决心痛改前非，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革命。

1977.3.24

二十一、钟定栋的《认罪书》(节录反军乱军部分)

五、反军乱军。我把解放军视为推行民兵改造黑纲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积极反军乱军的罪恶目的，是为“四人帮”篡夺民兵领导权、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服务的，表现在：

(一)几年来，我向四人帮一伙写黑信、告黑状，以及代人转递黑信，共有十三次之多，主要的内容：我攻击警备区反对民兵改造、宣传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走老路”，反对民兵所谓“走上社会”抓人、关人等等，由于我的写黑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例如1969年初，由我负责起草，和张宝林等人，共同向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提供了关于警备区，通过人武部所谓向已停止活动的基层人武专职干部发毛主席著作、宝像，恢复了老渠道等等内容的黑信后，王洪文等人根据我提

供的黑材料，整了警备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并明确规定了不准警备区过问，民兵工作一律要经过文攻武卫指挥部下达。1973年3、4月间，我向马徐王写了攻击警备区另发民兵简报和另搞民兵工作计划，搞乱基层的黑信后，徐景贤批评了警备区所谓搞军事一条线，结果被迫停发了简报和民兵工作计划。在1973年9月间，我把警备区编写的民兵故事书籍草稿送给了马徐王，我并附了一封黑信，攻击警备区利用编写民兵故事，宣传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反对民兵工作的所谓新鲜经验等。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看到后，都作了黑批示，整了周司令等领导同志，并下令停发了民兵故事材料。在1974年3月间，我和郑惠仪两人向王洪文、张春桥送了一份全面攻击警备区领导所谓破坏民兵改造的黑材料后，结果警备区许多领导同志再次挨了整，周司令被整得心脏病发作，患了重病。1974年下半年，我告黑状反映了南京军区所谓在上海交运局擅自组建了三个民兵汽车团后，马天水作了黑批示，结果军区布置建立的三个汽车团被我撤消了。

(二)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时，我布置炮制和转发三张反革命大字报。

1974年2月3日王秀珍窜到市指挥部向我们交底后，我对政工组李根发说：王秀珍专程来，要我们联系民兵建设上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揭矛盾写大字报，现在看来时机也到了，可以先从阎波身上开刀，然后把矛头引到警备区那里去。在我的煽动布置下，李根发写了(大意)为什么有人敢于提出要对民兵指挥部实行反改造；为什么有人敢于反对民兵抓阶级斗争的“新生事物”；为什么过去批判过的问题，现在有人重新又提出了疑问，根子究竟在什么地方等等内容的八个为什么，十个为什么的二张煽风点火的反革命大字报。我看了很满意，并唆使李贴在机关醒目的地方。后来，静安区指挥部周天明到市指挥部来看反军乱军大字报时，我对周说：应该积极投入运动，写大字报要抓住实质，现在发生的问题在下面，根子是在上面等，我煽动他把矛头指向警备区。

在我的煽动影响下，2月14日下午，周天明送来了一张所谓促头头的全面攻击警备区领导的反革命大字报。我和李彬山等人就乘机大做文章，当晚向机关作了动员，我煽动大家要跟上所谓的形势，向周天明等人学习，我们并把这三张大字报作为煽风点火的黑炮弹，连晚印发到了十个区指挥部和直属师团，这样造成了反军乱军的大字报越贴越多，把军区、警备区攻击得一无是处，还点了许多领导同志的名。

(三)炮制所谓一揭、二揭、三揭的反动大字报。1974年2月中旬，我和李彬山等人决定在市指挥部刮起第二次贴反军乱军大字报的罪恶活动后，我窜到作战组策划写专题大字报，我向章金根和钱虹、史美钧等人煽动说：我们组里要积极带头写出一些有质量的大字报，同时，我还向他们提供了黑炮弹，我把原来向马徐王等人告黑状的材料，交给他们作为写大字报的内容，在我的策划下，炮制了

一揭、二揭、三揭攻击警备区所谓破坏民兵建设的专题大字报，并点了周司令的名，我还带头签了名，流毒影响是很大的。

(四)煽动军队干部反军乱军。1974年2月中旬，我和李彬山等人召开了区指挥部军队领导干部的黑会，煽动他们把矛头指向警备区，我在会上说：区里发生的问题，根子在上面，有些人思想因循守旧，总想维持过去的老做法，至今不承认指挥部，我煽动他们贴反军乱军的大字报，按照我们搞的一套积极投入运动。在我的流毒影响下，原黄浦区人武部长杨清河到市指贴了大字报，我专门替他腾出了房间，我还向杨煽动说：你是有“造反”精神的部长，并唆使人在杨的反动大字报旁边又贴了一张支持杨部长所谓“革命行动”的反动大字报，我还签了名字，我的罪恶目的，煽动军队干部反军乱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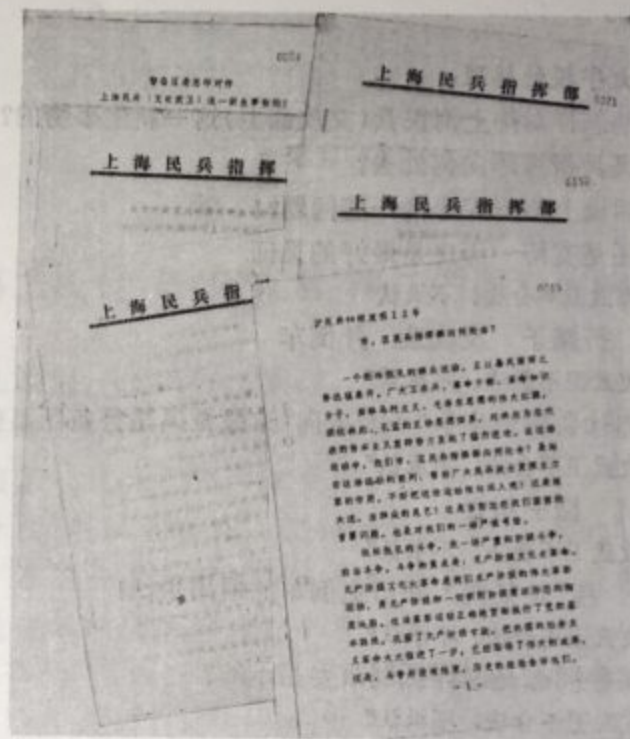
(五)煽动群众冲击警备区。1974年4、5月间，周宏宝向我传达了马徐王要我们组织人到警备区贴反军乱军大字报捅“蚂蜂窝”的黑指示后，我当时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对毛主席亲自缔造的解放军是十分仇恨的，我向作战组章金根等人煽动说：警备区有些人“老框框”很厉害，对运动消极抵触，警备区机关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看来要烧一烧，才能解决问题。我布置章金根把作战组原来写的反军乱军大字报全部复抄出来，贴到警备区机关大院醒目的地方，要他们有震动，我的罪恶目的，妄图煽动警备区的同志支持我们一起搞反军乱军的活动。在我的布置下，章组织了人员把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大字报、标语等都贴进了警备区机关大院，从马路到大楼都搞得一塌糊涂。我自己也先后二次窜到警备区看大字报，为他们撑腰打气，我煽动群众冲击警备区，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犯了罪。

(六)策划把矛头指向警备区的反革命秘密战备。1974年4月初，王秀珍向我和周宏宝等人交了底，她传达了王洪文的黑指示，要我们想得复杂一点，要防止军队有人所谓搞“名堂”……，我心中完全有数，要我们把枪口指向解放军了。我当时紧跟四人帮搞篡党夺权活动，根据王秀珍等人的黑指示，一手策划了名为保卫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实为反军乱军的秘密战备的方案。

钟定栋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

二十二、上海民兵指挥部攻击、诬陷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的大字报选编照片(影印件)



下面是这些大字报的标题：

1. 警备区是怎样对待上海民兵(文攻武卫)这一新生事物的?
2. 市、区民兵指挥部向何处去?
3. 在民兵建设上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4. 是扼杀还是支持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一揭“文攻武卫不合法、不承认”
5. 换班子 折摊子 反改造 开倒车
二揭“文攻武卫不合法、不承认”
6. 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不是方向”这股歪风是警备区某些人刮出来的
三揭“文攻武卫不合法、不承认”
7. 消极对抗 撒手不管
四揭“文攻武卫不合法、不承认”
8. “管、卡、压”是某些人开历史倒车的惯用手!
五揭“文攻武卫不合法、不承认”
9. 警备区某些同志是怎样抵制市委指示的?
六揭“文攻武卫不合法、不承认”
10. 南京军区不承认上海民兵指挥部的种种表现
11. 从《东海民兵》对上海民兵工作的报导看南京军区对上海民兵的“不承认主义”态度
12. 从一九七一年修改《民兵工作条例》看民兵建设上前进与倒退的斗争
13. 从编写民兵故事来看路线?
14. 从文攻武卫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民兵建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15. 抽象肯定 具体否定
——从民兵工作中的问题,看警备区对一元化领导的态度
16. 从态度 看路线
——南京军区对 162 号文件采取各取所需,名贯彻,实篡改,故作姿态

第四部分

“第二武装”是“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十年动乱期间,流氓阿飞横行,打砸抢成风,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厌恶社会秩序混乱,对此非常愤恨,但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四人帮”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心理要求,打着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旗号,大搞什么“刮红色台风”、“政治大扫除”等等的所谓打击流氓阿飞犯罪活动。在这些冠冕堂皇口号的掩饰下,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结果是流氓阿飞照旧为非作歹,社会秩序更加陷入混乱和恐怖之中。“四人帮”公然践踏、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唆使“第二武装”擅自制定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种种帮规、帮法,到处私设监房、公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十年来,仅被“第二武装”关押过的就有十万多人。一九七四年后,他们把所谓抓阶级斗争的着眼点转向了“党内走资派”。把专政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并且提出了“民兵的主攻方向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四人帮”直接控制、操纵“第二武装”大搞法西斯专政犯下了累累罪行。

一、查封中央各部和各省、市驻沪办事处

“文攻武卫”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大的行动就是查封中央和各地驻沪办事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了树立“第二武装”的“威风”,切断中央各部及各省市与上海的联系,巩固他们对上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统治,经过一番策划,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对中央各部、各省市驻沪办事处搞突然袭击,对各驻沪办事处工作人员实行软禁,对档案、帐册、物资进行搜抄、查封。这次行动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至六八年二月十九日结束,共查封六百三十一个单位,查封房屋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二平方米。下面是这次查封行动前后炮制的种种材料:

1.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查封驻沪办事处方案, (代号为《1125工程》) 的影印件

1125工程方案

一. 行动步骤

1. 战斗动员, 于某日行动, 上午12:00由指挥部召集各指挥员负责人集中, 由时宝林同志作战斗动员, 说明意义, 熟悉计划, 明确分工, 交待政策, 并注意事项, 熟悉地形。
(由各中队提供口头交待提纲)

2. 战斗动员后,

① 分别发介信, 作战图, 由各战斗组人员查看, 熟悉地形, 由唐总负责。

② 了解熟悉各员联络员

③ 由唐总同志发给各负责人指挥部的工作证, 按图出发, 架棚, 量竹, 供时, 二部, 手电话(自备)

④ 各中队进行分工, 专人负责, 小队长, 由唐总, 小队长, 由各中队, 由各中队, 由各中队

3. 上午12:00, 队伍分块按指定地集合, 集合地

① 文化广博

② 人民广播电台

③ 文攻武卫指挥部

集合完毕, 各负责人分别进行交待, 动员, 并回队好交待。

2. 查封驻沪办事处作战计划的影印件

-016

1125工程作战计划 (12.7草案)

一. 作战工作

1. 组织指挥

①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地址: 南京路140号, 电话: 214411, 214412, 214413, 214414, 214415, 214416, 214417, 214418, 214419, 214420, 214421, 214422, 214423, 214424, 214425, 214426, 214427, 214428, 214429, 214430, 214431, 214432, 214433, 214434, 214435, 214436, 214437, 214438, 214439, 214440, 214441, 214442, 214443, 214444, 214445, 214446, 214447, 214448, 214449, 214450, 214451, 214452, 214453, 214454, 214455, 214456, 214457, 214458, 214459, 214460, 214461, 214462, 214463, 214464, 214465, 214466, 214467, 214468, 214469, 214470, 214471, 214472, 214473, 214474, 214475, 214476, 214477, 214478, 214479, 214480, 214481, 214482, 214483, 214484, 214485, 214486, 214487, 214488, 214489, 214490, 214491, 214492, 214493, 214494, 214495, 214496, 214497, 214498, 214499, 214500, 214501, 214502, 214503, 214504, 214505, 214506, 214507, 214508, 214509, 214510, 214511, 214512, 214513, 214514, 214515, 214516, 214517, 214518, 214519, 214520, 214521, 214522, 214523, 214524, 214525, 214526, 214527, 214528, 214529, 214530, 214531, 214532, 214533, 214534, 214535, 214536, 214537, 214538, 214539, 214540, 214541, 214542, 214543, 214544, 214545, 214546, 214547, 214548, 214549, 214550, 214551, 214552, 214553, 214554, 214555, 214556, 214557, 214558, 214559, 214560, 214561, 214562, 214563, 214564, 214565, 214566, 214567, 214568, 214569, 214570, 214571, 214572, 214573, 214574, 214575, 214576, 214577, 214578, 214579, 214580, 214581, 214582, 214583, 214584, 214585, 214586, 214587, 214588, 214589, 214590, 214591, 214592, 214593, 214594, 214595, 214596, 214597, 214598, 214599, 214600, 214601, 214602, 214603, 214604, 214605, 214606, 214607, 214608, 214609, 214610, 214611, 214612, 214613, 214614, 214615, 214616, 214617, 214618, 214619, 214620, 214621, 214622, 214623, 214624, 214625, 214626, 214627, 214628, 214629, 214630, 214631, 214632, 214633, 214634, 214635, 214636, 214637, 214638, 214639, 214640, 214641, 214642, 214643, 214644, 214645, 214646, 214647, 214648, 214649, 214650, 214651, 214652, 214653, 214654, 214655, 214656, 214657, 214658, 214659, 214660, 214661, 214662, 214663, 214664, 214665, 214666, 214667, 214668, 214669, 214670, 214671, 214672, 214673, 214674, 214675, 214676, 214677, 214678, 214679, 214680, 214681, 214682, 214683, 214684, 214685, 214686, 214687, 214688, 214689, 214690, 214691, 214692, 214693, 214694, 214695, 214696, 214697, 214698, 214699, 214700, 214701, 214702, 214703, 214704, 214705, 214706, 214707, 214708, 214709, 214710, 214711, 214712, 214713, 214714, 214715, 214716, 214717, 214718, 214719, 214720, 214721, 214722, 214723, 214724, 214725, 214726, 214727, 214728, 214729, 214730, 214731, 214732, 214733, 214734, 214735, 214736, 214737, 214738, 214739, 214740, 214741, 214742, 214743, 214744, 214745, 214746, 214747, 214748, 214749, 214750, 214751, 214752, 214753, 214754, 214755, 214756, 214757, 214758, 214759, 214760, 214761, 214762, 214763, 214764, 214765, 214766, 214767, 214768, 214769, 214770, 214771, 214772, 214773, 214774, 214775, 214776, 214777, 214778, 214779, 214780, 214781, 214782, 214783, 214784, 214785, 214786, 214787, 214788, 214789, 214790, 214791, 214792, 214793, 214794, 214795, 214796, 214797, 214798, 214799, 214800, 214801, 214802, 214803, 214804, 214805, 214806, 214807, 214808, 214809, 214810, 214811, 214812, 214813, 214814, 214815, 214816, 214817, 214818, 214819, 214820, 214821, 214822, 214823, 214824, 214825, 214826, 214827, 214828, 214829, 214830, 214831, 214832, 214833, 214834, 214835, 214836, 214837, 214838, 214839, 214840, 214841, 214842, 214843, 214844, 214845, 214846, 214847, 214848, 214849, 214850, 214851, 214852, 214853, 214854, 214855, 214856, 214857, 214858, 214859, 214860, 214861, 214862, 214863, 214864, 214865, 214866, 214867, 214868, 214869, 214870, 214871, 214872, 214873, 214874, 214875, 214876, 214877, 214878, 214879, 214880, 214881, 214882, 214883, 214884, 214885, 214886, 214887, 214888, 214889, 214890, 214891, 214892, 214893, 214894, 214895, 214896, 214897, 214898, 214899, 214900, 214901, 214902, 214903, 214904, 214905, 214906, 214907, 214908, 214909, 214910, 214911, 214912, 214913, 214914, 214915, 214916, 214917, 214918, 214919, 214920, 214921, 214922, 214923, 214924, 214925, 214926, 214927, 214928, 214929, 214930, 214931, 214932, 214933, 214934, 214935, 214936, 214937, 214938, 214939, 214940, 214941, 214942, 214943, 214944, 214945, 214946, 214947, 214948, 214949, 214950, 214951, 214952, 214953, 214954, 214955, 214956, 214957, 214958, 214959, 214960, 214961, 214962, 214963, 214964, 214965, 214966, 214967, 214968, 214969, 214970, 214971, 214972, 214973, 214974, 214975, 214976, 214977, 214978, 214979, 214980, 214981, 214982, 214983, 214984, 214985, 214986, 214987, 214988, 214989, 214990, 214991, 214992, 214993, 214994, 214995, 214996, 214997, 214998, 214999, 215000

3. 查封行动准备工作的字条

1. 搜查 (1-4-19)
 2. 搜查 (1-4-19)
 3. 搜查 (1-4-19)
 4. 搜查 (1-4-19)
 5. 搜查 (1-4-19)
 6. 搜查 (1-4-19)
 7. 搜查 (1-4-19)
 8. 搜查 (1-4-19)
 9. 搜查 (1-4-19)
 10. 搜查 (1-4-19)

4. 查封行动指挥部的分工及各组电话

指挥部各组电话
 指挥部: 王洪文
 王承龙
 张宝林 211768 212414
 (303室)
 作战组: 张宝林 (兼)
 钟定栋 (兼)
 李福富
 余小兵
 武刚生
 秘书组: 张德永
 郑龙兴
 顾正轩
 顾忠
 魏成明
 王水仁
 联络组: 刘正 214092 213017
 安立伦 213936 210668
 214681
 翻译组: 史 210224 233238
 234907 237237
 刘恩波
 王成刚

5.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查封驻沪办事处的通告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通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我部决定自即日起，对各部、省、市、自治区、地、县驻沪办事处(工作组)实行查封。

调查，这些单位的走资派，不仅长期在沪，逃避历史运动，并且利用在沪机构，包庇坏人，窝藏黑材料，进行投机倒把，非法贪污，发展资本主义势力，破坏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的甚至幕后策划，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当地两派群众的分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上海的革命新秩序，为了支持各部、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市革命工人、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力支持下，我部对上述单位坚决采取革命行动，将档案、帐册、物资、资金全部进行查封和冻结。

上述单位的人员，在限期内一律无条件地回原部、原地参加运动，积极揭露本部门的走资派和上海地区的坏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协助我部做好这一工作。

今后，凡需要在上海设立机构的，一律要经过国务院批准和征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意。

在此，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谁如果胆敢起哄捣乱，破坏，我部将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特此通告

6.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印制的封条



7. 上海《工人造反报》对查封行动作的报导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

阶级斗争。

工人造反报

第七十五期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巩固革命新秩序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查封外地驻沪办事机构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上海的革命新秩序，为了支持各部、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市革命工人、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力支持下，我部对上述单位坚决采取革命行动，将档案、帐册、物资、资金全部进行查封和冻结。

上述单位的人员，在限期内一律无条件地回原部、原地参加运动，积极揭露本部门的走资派和上海地区的坏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协助我部做好这一工作。

今后，凡需要在上海设立机构的，一律要经过国务院批准和征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意。

在此，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谁如果胆敢起哄捣乱，破坏，我部将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群众专政的

这些机构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也是“四人帮”搞复辟倒退的工具。它们长期在沪，逃避历史运动，并且利用在沪机构，包庇坏人，窝藏黑材料，进行投机倒把，非法贪污，发展资本主义势力，破坏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的甚至幕后策划，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当地两派群众的分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上海的革命新秩序，为了支持各部、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市革命工人、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力支持下，我部对上述单位坚决采取革命行动，将档案、帐册、物资、资金全部进行查封和冻结。

上述单位的人员，在限期内一律无条件地回原部、原地参加运动，积极揭露本部门的走资派和上海地区的坏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协助我部做好这一工作。

今后，凡需要在上海设立机构的，一律要经过国务院批准和征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意。

在此，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谁如果胆敢起哄捣乱，破坏，我部将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巩固上海革命新秩序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阶级斗争就是如此激烈

必须彻底揭开
阶级斗争盖子

是办事处，还是“防空洞”

革命斗争是决定国家的天下

触目惊心的
阶级斗争



二、查封行动遭到中央有关部和许多省市的质问和抗议

从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文件档案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央有关部和许多省市革委会以及驻沪办事处工作人员，对文攻武卫的查封行为纷纷提出质问和抗议。

1. 山西省革会、六机部等单位对查封行动提出的意见

摘自文攻武卫指挥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查封各部、省办情况(三)》

山西省革委会表示不理解

山西省革委会给市革委会的电报中称：你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于十二月七日查封了我省驻沪办事处，要清查有否窝藏黑材料，包庇省内走资派，及搞投机倒把，并限期离沪。此事是否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我们不了解，也不理解，望答复。

六机部军管会提出二点意见

上报总理和粟裕同志

六机部军管会就查封该部驻华东供应办事处，提出二点意见给市革委会，并上报周总理和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粟裕同志。这二点意见摘要如下：

一、如果市革命委员会同意查封华办，请正式电告军管会，以便考虑今后怎么办。

二、查阅文件，将涉及到会不会泄密问题，建议派可靠人员有组织查阅，以确保国防机密。

江苏要市革会同各省审查后决定今后怎么办，审查期间业务照常进行

江苏省商业厅来电申述他们驻沪办事处的工作重要，并说工作全部停止后对该省在沪产品调入工作影响很大。还说“对做好秋后旺季市场和两个节日供应工作不利，要市革委会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成工作组会同各省、市、区作专题研究解决。”还说亦可由各省、市、区革委会、军管会组成工作组，对在沪机构情况进行审查，在审查期间业务工作仍照常进行。

2. 煤炭部驻沪办事处工作人员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摘自文攻武卫指挥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查封各部、省办情况(十八)》

一场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煤炭部沪办人员座谈会纪实

本月十四日，文攻武卫指挥部同志去煤炭部沪办联系工作，被该部办人员拖住，说要反映情况，要求解答问题。他们问：“文攻武卫指挥部是群众组织，还是权力机构？”又说：“我们要向上级反映情况，指挥部为什么不下来听听意见？毛主席还亲自视察几个省市，接触群众呢！”为了了解这个部办人员的思想情况，联络员和40路文攻武卫负责人等同志事先作了准备后，召开了座谈会，听他们的反映。座谈会从十五日下午一时开到五时十分。有50多人参加，16人发了言。从发言的情况看，多数人抵触情绪很大，有的人还对我们进行污蔑攻击。现将他们的发言和我们的讲话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对革命行动很不理解，抵触情绪极大

他们在座谈会上提出：“你们文攻武卫是群众组织，我们也有群众组织；你们是造反派，我们也是造反派，为什么对我们不相信？”说什么“革命不能冲昏头脑。”他们还问：“我们办事处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单位？是属于精兵简政，还是属于查封对象？”“为什么要把驻沪办事处一律撤消？我们很不理解。”他们辩解说：“不可能每个办事处都有问题，就我单位讲，所谓黑材料，是1965年四清前排队用的，够不上黑材料；窝藏走资派，搞投机倒把，套购我们是有的，地下工厂问题，我们是通过煤炭部和上海市的，是挂牌的，缺点是从矿井抽来工人，长期住旅馆，就这一点也套不上地下工厂的帽子。因此，《通告》对我们是挂不上号的。”

他们还说：“所谓‘这些部、省办运动搞得不透，成了防空洞’运动搞得透不透不能作为把我们逼回去或撤回去的理由。”“办事处如果不需要，为什么会存在十多年？”他们说：“查封、取缔是对反革命组织，我们不是反革命组织，为什么要用专政的手法，我们不懂。”“我们是国家任命的，为什么要捣？”“群众组织有什么权力撤销中央部办机构？”他们提出：“要求张春桥同志给我们部办人员开大会，思想搞通了我们就走，否则你们讲一定、一定、一定走。我们就讲：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走。”

对革命行动恶毒污蔑，企图把我们挤走

有个科长朱振华竟在会上恶毒地污蔑说：“这次行动，把我每个人的抽屉都封了，都查了，是不是执行了反动路线？好象帝国主义对待工人一样，不讲清情况和道理，就叫走！走！走！拿着铁棍子对待我们。”

有人还污蔑我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有个人说：“我是造反队队委，现在叫我靠边站，成了反革命了。”他还挑衅说：“要打的话，你们华东师大再来几个也不在我话下，我是讨饭出身的，不怕。”另一个人说：“我抗美援朝革命搞了好几年，现在反而成了反革命了？”

还污蔑我们是夺中央的权，为了要东西方便。有个人说、“有人说‘这是一月革命夺权的继续’，大概你们要东西不方便，夺过来要多少有多少”。“这牵涉到夺中央的权，周总理讲‘中央的权不能夺’”。“有人还污蔑我们工人无知。一个人说：“你们是拿榔头的，对我们机关情况不了解，不懂不要装懂，不要不调查研究就乱下结论。”

有人还狂妄提出：地下工厂这个名称是谁提的？要揪出黑后台！这是制造工人与部办人员的矛盾。”

用中央文件吓我们，用生产压我们

会上，他们提出，“中央文件规定，把煤炭放在第一位，轻工第二位，化工第三位，军工第四位。这是毛主席亲自批的。”“明年一二月份生产的物资准备，在今年就要搞，否则要影响生产，你们能负责吗？”“我部办关系到十个省八十多个煤矿，二十万煤矿工人的生产，如果我们机构撤销，是否叫人家直接到厂里去买各种物资？好比小孩子买玩具，不到百货公司而到厂里去买，能行吗？”

他们还提出许许多多具体问题：

如68年合同开始订了怎么办？小工厂停工了怎么办？等等要我们答复。

……。（略）

三、王洪文要“第二武装”准备镇压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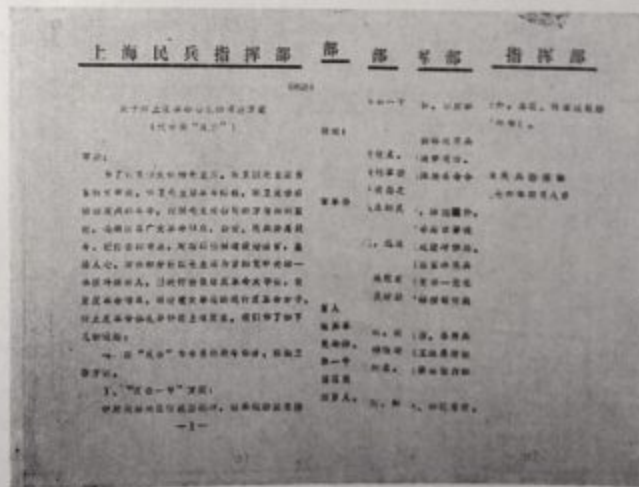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怒潮。这使“四人帮”惊恐万状，他们极端害怕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烈火烧到上海，乱了他们的阵脚。王洪文赶忙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要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于是王秀珍紧急召集了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和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策划炮制了代号为“反击”的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的实施方案》。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把“第二武装”的枪口是对准上海军民的。

1. 王秀珍的揭发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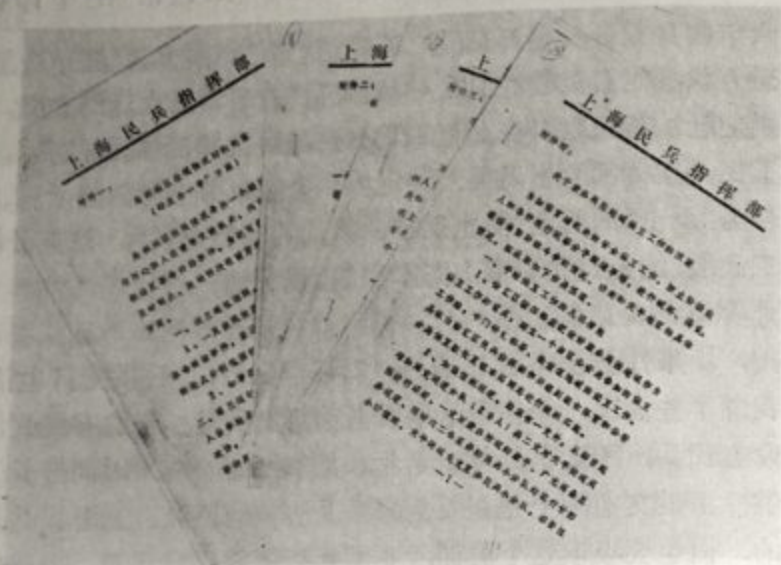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被粉碎后，四月八日凌晨三时，王洪文打电话给我，问上海情况，我说了些情况，他在电话里攻击首都民兵说：有的有民兵没有汽车，有的有汽车没有民兵，不配套，再加上北京是单行道，结果时间拖长了。这一点你对外不要讲。王洪文实际上是在耍两面派手法。他还说：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有经验的，但也要吸取这个教训，要民兵指挥部作好部署，把我的意见告诉指挥部。第二天，我就去民兵指挥部，传达了王洪文黑“指示”的精神，要他们作好部署。王洪文的所谓“部署”，实际上就是要为反革命武装叛乱作好准备。“四人帮”发动反革命叛乱是早有预谋的，我积极参与了这个阴谋活动。

王秀珍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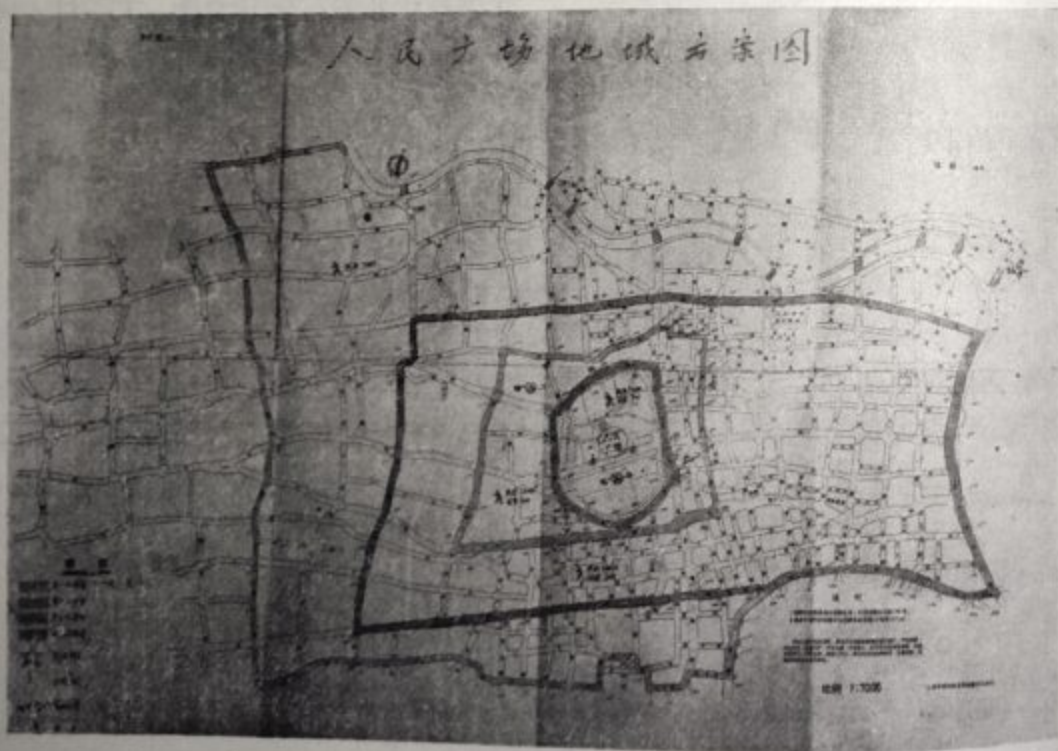
2. 上海民兵指挥部拟制的镇压群众的代号为“反击”方案的影印件



这是所谓“反击”方案的四个附件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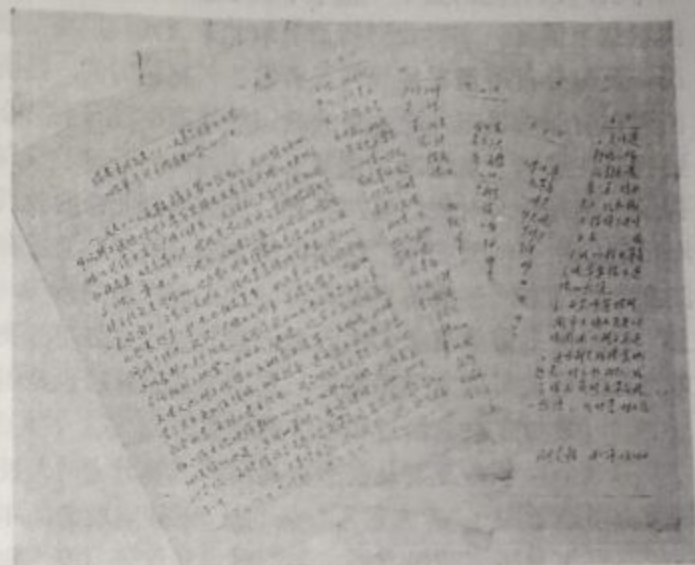


这是《方案》中的“人民广场地域方案图”(照片)



3. 钟定栋关于制定“反击”方案经过的揭发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反击一二三反革命方案出笼的情况在1976年4月“四人帮”炮制了诬陷邓副主席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所谓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在4月初，王秀珍先后把我和施尚英，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等人找到了东湖招待所去了二次。第一次在一个晚上，我们去了之后，王对我们说：有件事情要告诉



你们，现在有人利用悼念周总理的名义，正在广场闹事，事态正在扩大，情况发展得相当严重，闹事的人也越来越多，情况也相当复杂。她后来向公安部祝家耀询问了情况，祝说：广场上人很多，还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制止这个情况。在所谓闹事的人中不少是高干子弟，当场抓到了姚登山的儿子，又说：现在大家也很急，王洪文也到了现场正在研究办法等。在那晚，她布置了民兵要加强值班，加强战备，还要民兵和公安注意社会动态，要防止发生情况，我当时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也怕上海出现这样类似的情况，从那晚开始，我布置了加强值班巡逻，在我的策划下，每晚保持了200~300支巡逻队一直保持到了去年十月反革命武装叛乱垮台为止。第二次，过了一二天，王秀珍又把我们找去了说：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是控制了，但还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把闹事的人全部围在广场里正派了宣传车在做工作，她又说：在所谓闹事的人中，看来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少是高干子弟，看来后面是有一些人支持的，现在发生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事情，她把反革命矛头指向了中央领导同志。她又说：王洪文表扬了上海民兵有战斗力，北京的民兵是应付民兵一点也没有用，到了现场也都拉不上去，从北京的情况看来教训也不少，北京的大多数工厂在郊区，有些单位有了人没有车辆，队伍不能及时拉出来，结果使情况搞得越来越严重了。在那晚，王秀珍还向我们传达了王洪文的两条黑指示：①要我们结合上海的情况研究一下，要很好回顾总结所谓“打联司”的经验。如有情况要做到人、车、长矛配套，队伍要及时拉出来。王

秀珍又说：车辆配套的问题很重要，过去在“打联司”时王明龙专门坐镇交运局调动车辆，没有他的签字一辆车子也不能调动的，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要大家注意这个情况。②要我们所谓吸取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教训，要学会及时发现情况，及时分析所谓在矛盾还没有发生转化的时候，提前下决心采取行动，把事态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说北京的教训就是事先没有下决心，使问题搞得越来越大，要我们注意这一点情况。这是王洪文对我们下达了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予演的黑指示。王秀珍又对我们说：要我们根据所谓北京的教训考虑制订出一个应付在上海可能发生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方案，要我们考虑有多种设想，要加强巡逻，注意掌握动态，还要防止有人可能在人民广场闹事等，我当时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当场向王秀珍表示了决心说：请领导放心好了，我们根据北京的情况和王洪文的指示马上研究方案抓落实，我的表态王秀珍也是很满意的。

二、炮制方案的经过和牵涉的有关人。

①这个反革命方案是我一手炮制的，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当时死心塌地紧跟了“四人帮”，马、徐、王诬陷敬爱的邓副主席，把我们的革命老前辈都看作为所谓的民主派、走资派、复辟势力等，我策划炮制这个反革命方案的指导思想和罪恶目的，都是把反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血腥镇压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②从东湖回来后，施对我说：要想得复杂一点，如上海发生情况，我们要把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我把方案抓紧马上搞出来。

③我根据王洪文、王秀珍的黑指示，由我自己起草了所谓反击一二三的提纲，大体内容，以人民广场为背景，设想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采取三种措施。如人民广场、南京路等局部地区发生情况的措施；事态继续扩大或在闹区若干地区同时发生问题的措施；在全市范围内发生类似情况的措施。

④……我把写好的初稿送给施尚英修改审定，由施亲自上报。施分送了三个地方：一份上报马天水，王秀珍的，施批的意见：请马天水、王秀珍阅示。另一份，送给公安局和警卫处传阅的，施批的大意是：请薛干青、康宁一阅示。后来，施告我说：王秀珍也是很满意的，没有意见，要我们抓好落实，还要我们与公安局一起研究一下搞个联合方案。施还说：对方案的措施还要进行预演。

三、为落实反击一二三方案进行了如下反革命的预演活动。

①在4月7日晚上我策划了公安、民兵240辆摩托车的反革命武装示威游行，这样做的罪恶目的，把反革命矛头指向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向党中央施加压力的反革命武装示威游行，在那天晚上王秀珍、叶昌明等人还到了人民广场煽风点火，王秀珍还向大家进行了反革命动员，要公安、民兵搞所谓的团结战斗，用实际行动反击……。她还说：现在天安门广场的问题解

决了，江青很高兴，专门替上海送来了用油沙豆做的老酒，准备请大家喝一点，她还说：这次公安、民兵的示威游行还报告王洪文亲自批准的，我当时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听了十分高兴，那天我们还替王秀珍拍了照片，把我们的罪恶活动都拍了照片。……。

②策划了以徐汇区枫林地区为背景的所谓保卫康平路的反革命预演。

③根据王秀珍的黑指示，我们与薛干青等人共同策划了“4220”联合预演反革命方案(详见附件)。

④策划了十个区的夜间拉练活动，我这样做的罪恶目的，为镇压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群众，为反革命叛乱预演作的准备，我当时想检查一下如发生所谓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看看队伍是否能及时拉得出来。并对通讯联络暗号以及公安和民兵的所谓配合等都作了布置，还要他们结合拉练进行预演。我还亲自向静安、长宁区姚铭一、王义德交了底，要他们想得复杂一点，防止应付发生类似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在一天晚上，我和施尚英、叶昌明、薛干青、吴立义等人到了静安区指挥部进行了反革命拉练预演，还拍摄了许多所谓反击……团结战斗联合预演的照片，这些都是成了我们搞反革命武装叛乱进行预演的罪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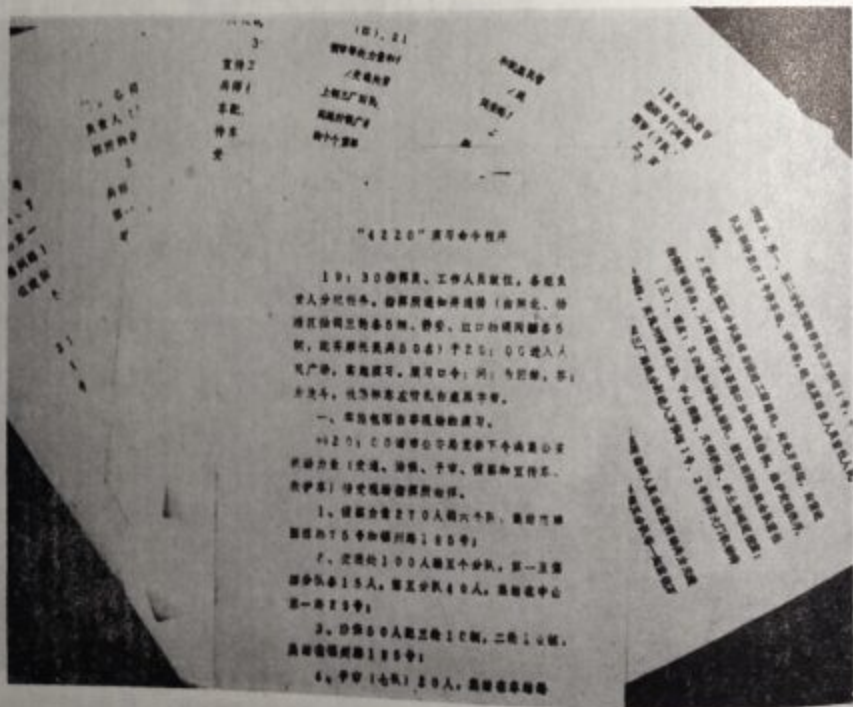
钟定栋 1977年11月16日

4. 王秀珍等“视察”“夜间拉练”时的照片二幅（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于上海人民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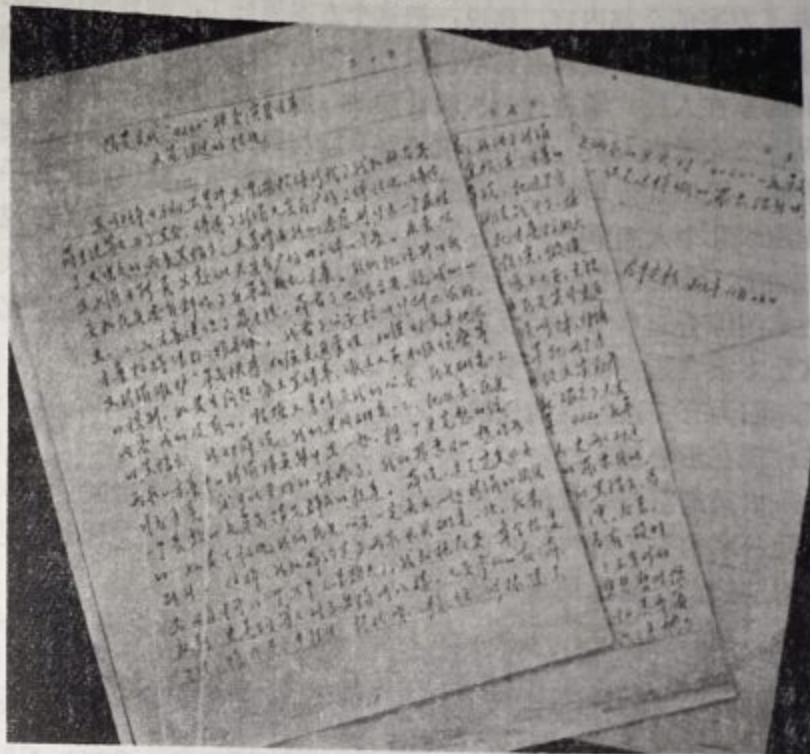




5. 一九七六年四月，公安、民兵联合拟制的《“4220”演习命令程序》



6. 钟定栋关于炮制“4220”演习方案的揭发交代



这是钟定栋揭发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揭发交代“4220”联合演习方案出笼经过的情况

在1976年4月初，王秀珍在东湖招待所找了我、施尚英、薛干青等人开了黑会，传达了所谓天安门广场事件情况，传达了王洪文的两条黑指示，王秀珍要我们考虑制订出一个应付在上海可能发生类似天安门广场的事件的方案。后来，公安和民兵各自都作了反革命叛乱方案。我们把炮制的反击一二三方案送给了薛干青，薛看了也很高兴，说我们的方案搞得很好，很具体。我看了公安搞的计划也很好，在所谓维护“革命秩序，加强交通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控制，如发生问题派出宣传车，派出人员加强侦察等内容我们没有的，根据王秀珍要我们公安、民兵研究一下的黑指示，我对薛说：我们共同研究一下，把公安、民兵两家的方案中的所谓特点集中在一起，搞一个更完整的统一行动方案，就可以更好的协作了，我的罪恶目的想作为一个长期的反革命镇压群众的预案。薛说，这是完全必要的，如发生情况我们民兵、公安一定要在一起所谓的团结战斗。这样，我和薛约定了两家头头研究一次，后来，在4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星期天），我和施尚英……等到了岳阳路八楼，公安参加的有薛干青、徐成虎……等人。开始大家

各自谈了原来方案的内容，我讲了所谓反击一二三方案的简单内容。……公安也讲了方案的全部内容。薛说：把这个方案搞好了，如有情况我们两家可以更好的团结战斗了，接着研究起草演习方案的内容，大家打算把方案搞好后，公安、民兵两家在人民广场进行一次联合预演，假设在广场发生了类似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公安派出人员，包括使用侦察手段与民兵一起监视抓人，交通民警实行交通管制，派出宣传车等，民兵采取实施包围设路障、封锁路口等手段。施尚英说：先组织几个人起草把两个方案捏在一起，以后再讨论一下。薛说：我们请王宗南参加吧，我说：我们就叫史美钧。这样，就确定了王宗南、史美钧两人根据我们的意图综合起草“4220”反革命方案，这些都是我的罪责。我记忆，王、史两人对这个方案在指挥部写了多天。……后来，准备工作也都做好了，也要进行预演了，因为有一段时间的气候不太好，我记忆，施尚英又传达了王秀珍的黑指示。说：现在形势缓和好转了，大的演习暂时推迟一下，后来没有搞预演的罪恶目的，也是怕暴露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这样就把“4220”预演搁了下来。后来，公安、民兵两家的头头对“4220”的反革命方案虽然没有再研究过，但是这样做的罪恶活动的做法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钟定栋 1977年11月16日

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证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唆使“第二武装”践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任意抓人、关人，私设牢房，擅立“帮规”、“帮法”，大搞法西斯专政。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区、县民兵指挥部尚存的有关资料，作了一个统计列表于后，因资料已不完整，所以这个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且这个统计还不包括“抓起来教育一下”就释放了的。

1. 十年间“四人帮”在上海搞法西斯专政几个数字的统计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利用“第二武装”实行法西斯专政几个数字的统计

数 单 位	项 目	关押人数			死亡			伤残			各种刑具			劳动学习			考察对象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手铐	棍棒	其它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总计		104,295	95,839	8,456	23	19	4	34	32	2	124	33	41	11,279	6,361	5,517	844	4,918	4,782	136	4,085	3,735	350
分	计	95,104	87,242	7,862	11	9	2	22	22		83	8	38	9,801	5,687	4,922	765	4,114	4,042	72	4,031	3,684	347
市	桥浦区	4,938	4,555	383							694	3		2,164	130		130	2,034	2,034		293	273	20
	虹口区	8,488	2,691	797	3	2	1				360	10		1,489	1,489	1,289	200				730	655	75
	河北区	10,953	9,858	1,095	1	1		17	17		976	10	30	711	711	682	29				338	315	23
	黄浦区	20,730	19,149	1,581				2	2		320	25		296	273	213	60	23	23		399	370	29
	静安区	3,247	3,219	28	3	3					763			780				780	752	28	349	307	42
	南市区	11,176	10,713	463				1	1		1,680	14	8	636	431	406	25	205	182	23	651	618	33
	卢湾区	13,488	12,103	1,385							220	5		1,482	1,013	889	124	469	458	11	437	384	53
	普陀区	12,165	11,127	1,038	3	3					1,180	1		183	183	150	33				346	328	18
	长宁区	5,293	4,605	688	1	1					200	2		540	356	305	51	184	184		284	251	33
	徐汇区	4,626	4,222	404				2	2		639	13		1,520	1,101	988	113	419	409	10	204	183	21
分	计	9,191	8,597	594	12	10	2	12	10	2	41	25	3	1,478	674	595	79	804	740	64	54	51	3
县	川沙县	1,383	1,219	164	2	2					380			307				307	278	29	5	3	2
	松江县	530	472	58							80	3		76	21	18	3	55	51	4			
	崇明县	438	402	36							140	3		228	228	196	32	238	216	22	3	2	1
	宝山县	2,552	2,524	28	2	2					288	10		238									
	南汇县	491	450	41				10	8	2	396	10	1	73	35	35		38	36	2			
	嘉定县	389	354	35	2	2		1	1		355			97	97	80	17						
	奉贤县	332	315	17							200	5		179									
	上海县	2,644	2,446	198	6	4	2	1	1		599	5	20	155	139	16		24	23	1	25	25	
	金山县	142	136	6							200	3	2	142				142	136	6			
	青浦县	290	279	11							104	2		138	138	127	11				21	21	

说明

2. “第二武装”抓人用的“查询证”

“第二武装”就凭这么一纸“查询证”代替了司法机关的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等法律文书，任意抄家、抓人、关人。而且各区民兵指挥部也印制了与“查询证”有同样作用的“收留证”。

这是“查询证”样张

查询证存根 编号 000392			
被查询人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家庭地址		
犯罪情况摘要与类型			
执行区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民兵指挥部	
查询证 编号 000392	
现通知	在 月 日 时来本部报
到，接受查询。	
	年 月 日
被查询人签字：	注：盖印有效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海员俱乐部和南京东路友谊商店门口，先设好埋伏，采取放爆竹、吹喇叭招引行人，突然包围，当场抓了三百九十九人，押到交通大学进行“审查”、批斗。这次行动王洪文、徐景贤、李彬山等人都到现场“观战”。

这是“第二武装”开出的“查询证”存根的一小部分



3.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海员俱乐部门口任意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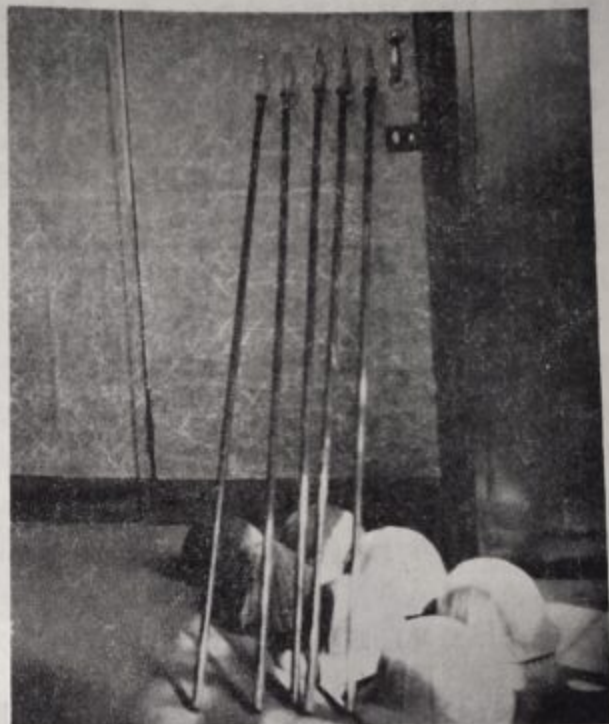
这是把在海员俱乐部和南京东路友谊商店门口抓住的群众在交通大学礼堂批斗时的照片



这是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在海员俱乐部门口准备抓人时的照片



4. 文攻武卫使用的藤帽、长矛等武斗工具



5. 上海民兵指挥部炮制的《上海民兵城市里弄小分队暂行工作条例》

右面是《条例》第一页的影印件

上海民兵城市里弄小分队暂行工作条例

(送审稿)

上海民兵小分队是上海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专政靠群众的专政”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继续激烈斗争中建立成长的，以工人阶级子弟管理和改造城市，随时保卫和坚守城市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锻炼、改造和建设民兵的重要途径。

上海民兵小分队是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教导，在街道党组织领导下，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发动和依靠群众，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把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组 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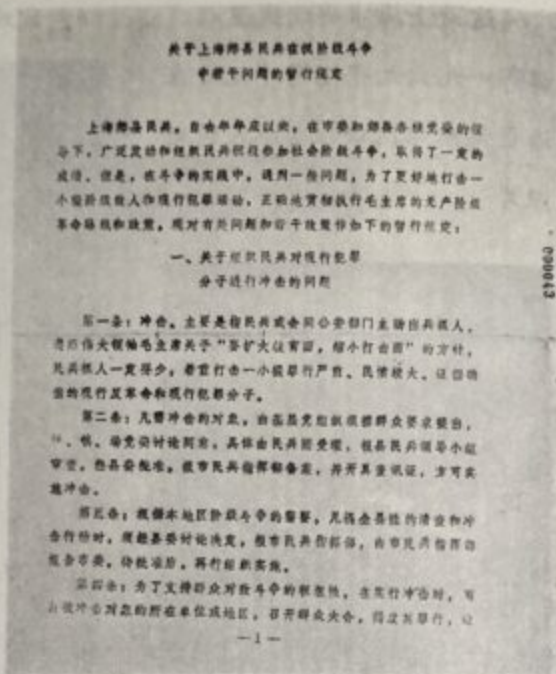
第一条：民兵指挥部按就近挂钩的原则确定民兵单位与里弄挂钩，或由民兵小分队，以里弄为战斗单位，统称：民兵小分队。

第二条：民兵小分队应保持以业余为主的原则，每支小分队由二三名相对固定人员和若干名业余的民兵组成，其

6. 上海民兵指挥部炮制的

《关于上海郊区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右面是《规定》第一页的影印件



五、对“第二武装”在上海县搞法西斯专政的调查

1. 上海警各区民兵工作调查组的调查报告

关于“四人帮”搞“第二武装” 在上海县实行法西斯专政的调查报告

今年一月，我们怀着十分愤怒的心情，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和市民兵指挥部坏头头在上海县搞“第二武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进行了调查。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苦心经营“第二武装”，他们打着民兵要抓阶级斗争的幌子，私设监狱，随便抓人、关人，施行种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肉刑，用拳头和刀枪对付人民、镇压人民，滥施法西斯暴行。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 法西斯专政是如何在上海县搞起来的？

上海县是上海市的一个近郊县，是上海市区的西大门。“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对这个县一直控制得很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县党代会，张春桥、王洪文都亲自参加，接见照相，并指派徐景贤兼任县委副书记，直接控制上海县。

“四人帮”搞“第二武装”，阴谋篡党夺权，把上海县作为郊区十个县的“点”。一九七三年十月，正是“四人帮”及余党马、徐、王疯狂经营“第二武装”，竭力攻击“民兵武装绝对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屁话”，大肆鼓吹民兵要“立法”、“执法”、“管法”，要“统”一切的时候，他们派上海民兵指挥部头头钟定栋到上海县新泾地区（北新泾镇和新泾公社），抓所谓农村民兵学城市民兵的“试点”，实际上就是在郊区基层搞“第二武装”的试点，也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的试点。钟定栋一到上海县就宣布：这个点是马天水的“点”，是王洪文的“点”，是通天的“点”。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试点计划，强令县、社（镇）党委执行。钟定栋一到点上，按照他们搞“第二武装”的蓝图，挥舞“民兵改造”的大棒，一刀砍掉了社（镇）人武部，挂出了民兵团部的牌子，搭起了直接控制的“班子”，造了关人的牢房和打人的棍子，一脚踢开了公安保卫部门和法院，明确提出把民兵捉人、关人、审讯、定案作为“试点”的主要内容。他叫嚷“试点”要“打好第一仗”。他的“第一仗”就是抓人。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他“试点”不到一个月，就出动新泾地区民兵二百九十名，从市区派民兵六十名支援，从化工学院派摩托民兵六十名，再从钟定栋一手控制的摩托团派摩托车二十四辆，在新泾地区一下子捉了八人，并在几个地方召开了好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大造声势，大发淫威，蒙蔽欺骗群众，为他们搞法西斯专政铺平道路。

在他们炮制的一份“关于新泾地区民兵冲击行动的报告”中，就对冲击对象由民兵团部直接逮捕、看管、审理等作了一系列规定，李彬山马上作了“我认为可以这样办，望办后应总结经验”的批示，于是，钟定栋在这个“点”上炮制了一份又一份的所谓郊区民兵抓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一面上报给“四人帮”和马、徐、王，一面在点上、在县里甚至在市里召开“经验交流会”，把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的那一套推广到上海县所有的公社和城镇，推广到上海市的十个郊县。上海县也被他们封为农村学城市的典型。“四人帮”余党马天水手舞足蹈地赞扬钟定栋“旗开得胜”。此后，钟定栋在上海县搞法西斯专政更疯狂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抓到社（镇）民兵团部和县民兵指挥部“管教站”，经过各种形式处理的共有九千七百六十名，占全县总人口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一。八。在钟定栋的那个点上，共抓人一千八百九十四名，占全县二十三个社（镇）抓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九点四，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均属人民内部矛盾，绝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群众。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他们在上海县搞的“试点”，是搞“第二武装”，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推行他们所要建立的法西斯统治的黑标本。

(二) “四人帮”在上海县是怎样搞法西斯专政的？

一、大造舆论，擅制“帮法”。“四人帮”要推行他们搞法西斯专政的那一套黑

货，必然要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搞“第二武装”，伪造“民兵改造”的指示，贩卖“文攻武卫”的“新鲜经验”，鼓吹民兵可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宣扬民兵“抓人合法”，“打人有理”。张春桥公开宣扬，处理群众纠纷，“民兵动动手也没有关系”，王洪文叫嚷，“文攻武卫”的威信“是打出来的么！”指挥部的坏头头也露骨地说：“我们的拳头不是吃素的”，“有些对象不怕‘法’，只怕‘刮’”。被他们打死、逼死人命后，还轻松地说：“总要付点学费么！”“黄浦江那么大，又没有盖子，要自杀有什么办法呢？！”“不要因为死了人，就不抓阶级斗争了”。不仅如此，他们更狂吠民兵要“立法”，“执法”，“管法”，“宪法上没有的东西，今后还可以写上么！”于是，各种规定、条例、章程即“四人帮”的“帮法”纷纷出笼。在钟定栋的点上，有逮捕、看管、审理的规定，县民兵领导小组在钟的授意下，有“关于民兵抓阶级斗争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市民兵指挥部还正式发了一个《关于上海郊县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现行犯罪分子进行冲击的问题》、《受理现行案件和处理权限问题》、《关于在押对象的审查处理问题》等等，一套套章程，一条条“帮法”，为他们抓人、关人、审讯、定案，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法律”依据，这样，“四人帮”提出的要“镇反”、“杀人”，“要抓起来判刑、枪毙他几个”等反革命叫嚣，在这里得到实施。

二、巧立名目，抓人关人。“四人帮”在上海县抓了那么多人，除了极少数应由公安部门依法逮捕的外，绝大多数人只是因有吵架、打骂、不正当男女关系或小偷小摸等一般性缺点、错误，有的则完全是些无辜的革命群众。但是，他们巧立繁多的名目，栽赃陷害，任意抓人关人。如有一对插队落户多年的知识青年，建立了正常的恋爱关系，一同返沪探亲，男的在女方家里吃饭，就被以“流飞”之罪抓来坐牢；有的男女青年学生在外边站了一会，也以“不正常恋爱”之罪名被捉了起来；青年王永福在新泾桥帮助送菜的社员推车过桥，社员为了感谢他，送给他几只蕃茄，他正在河边洗蕃茄时，被抓到民兵团部说他是“小偷”；有个十四岁尚未发育的孩子，竟以“奸污女青年”的罪名关在县“管教站”。青年王家孝，在农村插队落户表现好，参加了共青团，并被推荐到港务局当工人。时间不到三个月，因他对北新泾镇民兵团部一个民兵作风不正派，生活腐化看不惯，发生口角，互相扭抱，双方摔倒在地，那民兵被跌伤，就因此捏造罪名，列为“阶级报复”，关了四个多月，遭受烟头烫、闻马桶等四种肉刑。象这样吃冤枉官司的事例，实在是举不胜举。总之，他们靠了“四人帮”的“帮法”，抓人名目繁多，关人肆无忌惮，要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小青年在田野里捉蟋蟀，要抓；对民兵态度硬一点，要抓，连说几句公道话，也可以给你定个“无理取闹”的罪名抓起来。“四人帮”的“帮法”究竟在对谁实行专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三、私设监狱，滥施肉刑。在“四人帮”高压政策下，上海县一共私设了二十

四个监狱，真是社社有监狱，镇镇有牢房。对被抓来的人，滥施种种残酷的肉刑。如吊、打、捆绑、上手铐、跪砖头、喷气式、晒太阳、嗅马桶、烟头烫、含萝卜、套马桶盖，还有罚立、罚饿、不准睡觉、喂蚊子、钩鼻子等十多种，真是惨无人道。

打：打耳光，皮带抽，木棍敲，竹片刮，铁杆捣，无所不用其极。打是被抓来送进监狱时的“见面礼”、“杀威风”。有的人被打得昏迷不醒，用冷水冲醒后再打，强逼其承认所谓的罪名。

吊：将关押对象双手拉到背后，用绳子扎紧，吊起来，使其脚尖着地，脚跟离地，这样一吊就是好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有的甚至连续吊了整整两天，造成双手残废。

上手铐：有前铐、后铐、搭角铐，极其残忍。

喷气式：令人弯腰成九十度，头顶着墙壁，双手向后平伸，只准脚尖着地，不准动。

跪砖头：两膝下各放一块砖头，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跪不好就抽打。县管教站对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滥用此种肉刑。

有的还用皮带钩钩着被关押人的鼻子，在监狱院子内游走，把鼻血都钩出来了还不罢休。

他们滥施种种法西斯肉刑，不仅县管教站用，社（镇）民兵团部的监狱用，甚至发展到有的生产大队也私设公堂，随便审讯，严刑敲打，一片白色恐怖。

四、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四人帮”擅立“帮法”，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有的被搞成残废，有的被绑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骂摧残，逼得投河、上吊，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如刘永昌，因奸污、盗窃等问题，被关押在县管教站，后因在牢房内冒领一餐饭吃，被绑吊十九个小时而死亡；流飞分子唐新华，被关押在县管教站，因偷吃蚕豆，被反铐，又用绳子吊他整整两天，造成双手残废。

梅陇公社陇西五队青年社员许顺勇，一九七四年因与恋爱对象发生肉体关系被抓，痛打一顿后关押在民兵团部监牢里，第二天，又押到大队公开进行批斗，批斗后仍送回团部关押，逼得许吊死在牢房内。

杜行公社黎明大队六队女社员李惠莲（地主子女、耳朵有点聋），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生产队举行吊唁毛主席逝世仪式，她未听清时间，到田头一看，人都不在，连忙赶到生产队时，社员正在脱帽致默哀，她头上还扎了头巾，其他社员叫她拿下，她听清后即拿下头巾。就为此事，反映到大队后，除了逼她检查外，还连续三个深夜对李毒打、拉头发、跪木板，严刑逼供。第一个晚上将李叫到生产队仓库，令她低头托手立，时间长了李支持不住，就令她跪在木板上，她不肯

就拖到大队部，罚立、罚跪，李说耳朵聋听不清楚就打耳朵，李说头昏支持不住就打头，一直折磨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令其回家作检查。第二天晚上九时，又将李叫到仓库里，令她交代问题，李讲没啥交代，就打耳朵，脚踢，被打得直摇晃，就拉住头发打，一直打到下半夜。第三天晚上，李已被打伤躺倒在床上，民兵连长又派民兵叫她到队部去，李对丈夫讲：“我今晚去吃不了，要被他们打死的”。一面讲，一面起床下楼，到楼梯口就跌倒了，此时面色发白，手脚冰冷，处于昏迷状态，她女儿用湿毛巾敷她的头，苏醒后，仍被拖到仓库里。站不起来，只好躺在地上，还诬她要无赖，装死，将李拎起来，甩下去，连续几次，一直打到下半夜，还送到大队部令她写检查。李惠莲被逼得走投无路有冤难申，于第四天投河身死。

三林公社新华大队吴家生产队贫农社员吴默金(男、60岁、五保户)，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半夜拿人家一点冷饭、玉米等物，坐在这家门口吃，被发现后就将吴捆绑在水泥电线杆上，用木门闩、扫帚柄、塑料鞋底、拳头猛打吴的头部、背部、腿部。把这位老贫农社员活活打死。法西斯暴行，残忍到了极点。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四人帮”及其余党和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在上海县大搞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专政，草菅人命，完全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完全暴露了“四人帮”狂叫的所谓城市民兵建设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是什么样的货色。

(三)实行法西斯专政后果严重

应当指出，几年来，“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实行法西斯专政，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在上海县，一度造成白色恐怖。对不少工人、贫下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实行无情地迫害，根子在“四人帮”，责任在马、徐、王及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上海县广大民兵指战员是好的，是深受其害的。他们为了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县、社(镇)党组织和民兵组织采用高压政策，挥舞“四人帮”的帽子、棍子，强制推行他们那一套反革命黑货。谁要说个不字，提出非议，就以“路线不正”，“不搞阶级斗争”，“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等等来压你。全县专职武装干部、民兵干部、广大民兵和革命群众，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恨之入骨，早已民怨沸腾，万众怒对，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群众把县、社(镇)设的牢房称为“第二监狱”，把随便抓人、关人比作苏修新沙皇，把种种肉刑喻为渣滓洞一套，严厉责问他们：宪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八亿人民通过的宪法，你们遵守不遵守？经毛主席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颁发的民兵工作条例规定：民兵武装绝不能用来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执行不执行？你们循的是那家的法？专那一个阶级的政？大家指出，“四人帮”在上海县搞的这一套，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所需要建立的法西斯统治那一套，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一旦得逞，就是大资产阶级上台，法西斯上台，我们的党要变修，我们的国家就要变色，亿万人民就要人头落地，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就要吃两遍苦、受两茬罪。

“四人帮”在上海县搞法西斯专政罪行累累，流毒甚广，政治影响十分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破坏了民兵建设，破坏了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上海县搞的这一套，既有极大的反动性，也有极大的欺骗性，毒害、腐蚀了一些民兵干部和民兵。如参与逼死社员李惠莲的几个民兵说：当时民兵正在整组，连长在动员时说：对李惠莲审查是个“考验”，是“阶级斗争观念”问题，如果不参加这件事，一定会讲我们不抓阶级斗争，就会被开除民兵，有的民兵干部和民兵，在“四人帮”的高压和欺骗下，看不清“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利用民兵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反动实质，只认为是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违反政策纪律，是支流问题，不能坚决进行抵制，有的认为这样搞下去不行，但也无可奈何。

上海警备区民兵工作调查组

一九七七年二月

2. 上海警备区民兵工作组拍摄的“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的班房、刑具等部分照片。

这是“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大门口



右面是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的高围墙



左面是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岗哨亭

下图是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的班房



下图是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编号班房



这是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的审讯室



这是上海北新泾镇民兵团设立的班房



这是上海民兵上海县管教站使用的手铐



这是上海县北新泾镇民兵团设的地下班房，破窗是被关押者逃跑时撬掉的



右面照片是上海县新泾公社民兵团用的盔帽、长矛、特制打人棍



这照片是上海县漕河泾镇民兵团设的班房



(内部参考材料)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十九)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五部分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

党羽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1)

一、加紧装备第二武装，预谋发动武装叛乱……………(3)

1. 上海市财政局党委负责同志揭发“四人帮”为武装叛乱加紧私造、私购大量武器装备的罪行……………(3)

2. 马天水在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五年度民兵装备预算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4)

3. 马天水关于动用地方经费大量私造、私购武器问题的揭发交代……………(4)

4. 马天水关于突击发枪问题的交代……………(5)

5. 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突击发枪问题的交代……………(6)

6. 马天水在民兵指挥部《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7)

7. 施尚英关于突击发枪问题的揭发交代……………(8)

8. 突击下发武器的“军械调拨通知单”照片……………(9)

二、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9)